

第四章 邁向大東亞(下)：殖民地的文學動員--朝鮮

朝鮮於 1910 年遭受日本的併吞，正式被納入日本的殖民版圖之中，與台灣成爲支撐日本內地經濟以及其帝國發展野心的兩個重要資產，同時也是日本躍入新興帝國行列的重要表記。¹南有台灣作爲基石，是其通往南洋的經營之徑，北則有朝鮮作爲北進的門戶，是前進中國的重要據點，兩個殖民地在日本的帝國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給予本國經濟、物資的援助，戰爭期間，更提供了人力、物質上的資源以補充其戰力的不足。日本於併吞朝鮮的同年 10 月設立總督府，展開對朝鮮殖民地化政策的實踐，同時並設置成立相關統治機構官制。總督一職由日本陸、海軍部派遣校、將官階級擔任，直接領有朝鮮軍事指揮權，並享有司法、行政、立法三方面的主導，和台灣總督的權限相同，於殖民地握有極大的主導權。在統治層面上，日本當局給予總督府極大的自主權利，總督府的官制安排也具有獨立的自主性，經過歷任總督的經營，戰爭期間，作爲日本帝國經營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一員，在日本強勢推動的皇民化運動下，朝鮮不僅提供日本戰力上的經濟與物資之種種援助，另一方面，總督府致力的皇民養成之文化生產上也培養可供帝國借助的人才，並與這些菁英協力者構成了一種協力機制（collaboration system）²。可以說，殖民地對於日本而言，是其建構大東亞共榮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也因爲有殖民地的奧援，日本帝國主義能夠得以擴張的方式逐步擴充其東亞的版圖。

對於朝鮮的殖民地動員之概況，本論文第三章中所討論的台灣文學動員與大東亞共榮圈的複雜情況正可提供討論日據時期朝鮮文學動員議題的重要參考，特別是台灣與朝鮮兩個殖民地的總督府所扮演的角色與文化人在殖民社會的位置，以及戰爭期間在日本的大東亞帝國建設論中所擔綱的任務，都提供探討殖民地動員的重要線索，日本因戰爭而強力推銷的「皇國思想」對台灣與朝鮮的文

¹ 1910 年 8 月 29 日，日本公布了「韓國併合宣言」，完全接收韓國的統治權，名義上爲日韓合併，實際上是併吞韓國進而掌控了韓國的行政權。參見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 1840-1945》（上），東京：原書房，1965 年 11 月出版，頁 340-342。

² 並木真人對於「協力機制」解釋爲：即指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具有利用價值的治理方式。換言之，對統治者而言，透過本土菁英的協力可使統治深化落實，也可降低統治成本。對協力者而言，透過協力也可確保手中的利益，而且可以取得向現代化所需的各種資源。參見氏著〈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收入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2004 年 4 月初版，頁 102。本文將針對此協力機構的探究，檢視朝鮮的文人菁英們與總督府及帝國互動中的折衝與妥協與大東亞文學圈的關係。

化生產有了不同的質變效果，文化人與當局的妥協折衝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樣貌也各有不同。兩個殖民地的認同、抵抗、妥協等過程的不同也造成了殖民動員的差異性，在兩個殖民地皆任過官職的持地六三郎在「朝鮮與台灣」的演講文中對於兩個殖民地的不同處有詳盡的說明，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參照。³此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情況也導致日本在殖民地的治理方法上有所差異，雖然日本對朝鮮的殖民行政措施大多援引對台灣的殖民經驗而來，然而細部的治理卻是視現地狀況與民眾的反應而予以調整，無法完全比照施行。總體而言，在日本的統治期間，比台灣晚被納入殖民地的朝鮮，因日本長期對朝鮮半島的覬覦與侵略所累積的種種衝突矛盾，在「滅國」的沉重打擊下激發了朝鮮的抗日情緒與民族意識，也因而在殖民初期引發多次的武裝衝突，如：1909年由於不滿日本對朝鮮的侵略，伊藤博文被朝鮮人士暗殺身亡，合併朝鮮後的第一任總督寺內正毅也險遭暗殺，由此皆可窺見朝鮮的民族性格與社會狀況。

經過1919年「三·一運動」後，日本對朝鮮的統治又進入一個新階段，首先，朝鮮武裝民族獨立運動的破滅成為日本落實朝鮮殖民統治的一大契機，日本透過種種政令的施行並打出「文化統治」的懷柔統治策略企圖緩和緊繃的殖民社會。緊接著，著眼於媒體新聞、教育思想言論等方面的箝制，欲消除朝鮮高張的反日情緒以確保將朝鮮原有的國家體制順利轉化為殖民地統治。可以說，日本在歷經殖民初步的武裝抗日運動後，透過日語教育的推行，逐漸成功的在朝鮮建立了一套系統性的日本化知識體制，從而也培養了一批跨越語言障礙的朝鮮知識份子，以作為溝通日本與朝鮮的媒介。戰前的朝鮮，一方面有傳承自身朝鮮系統的「書堂」教育，雖然在成為殖民地之後，受到日本朝鮮教育令的影響，使其在數量上銳減，無法與日本設立的以「國語」（日語）為中心的學校制度相抗衡，然

³ 持地六三郎從六方面來比較台灣與朝鮮的不同。①自然地理環境比較上，朝鮮面積約為台灣的6倍，人口約5倍。氣候風土方面，台灣地處熱帶，物產豐饒，朝鮮物產則相對缺乏。②前近代歷史的不同，朝鮮方面對於過往歷史與文明抱持的自負自尊心，以及長久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所具有的國民感情的浸透，與台灣的歷史相異。③殖民地化過程的不同，被清朝於馬關條約割讓後的台灣，於日本佔領初期的兩年間允許台灣人有國籍選擇的自由，並且許可返回大陸，朝鮮方面則是形式上以自願合邦方式的征服，並非條約關係，也就是日本隨意的將朝鮮納為自身的一部分。④施政上的不同，在台灣可以做到不跟舊政府瓜葛的「創始施政」，然而朝鮮是以「任意的合邦」之名目，並以之前的政策為前提的「繼承施政」。⑤在台灣是退官之後才成為實業家，朝鮮則是先擔任實業家，在朝的日本居留民本著：「朝鮮的開拓究竟是誰做到的？難道不是我們苦心經營的結果嗎。」在朝鮮以強硬的態度把持發言權。⑥布教活動影響力的相異，在朝的美國傳道士勢力強大，對於政治抱持志向的朝鮮人在「亡國」的過程中成為基督教徒。這些初期條件的差異也影響了殖民政府在兩地的施政效果。參見持地六三郎〈台灣と朝鮮〉，《台灣時報》24號，1921年7月。

而此兩套知識系統一直並存於朝鮮。⁴到了戰爭期間，特別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朝鮮語跟台灣漢文一樣退出公眾場域，日語的一言堂主導了知識界，當 1940 年朝鮮語的報紙《朝鮮日報》與《東亞日報》遭當局強制廢刊後，也宣告總督府的政治勢力完全主導了朝鮮的文化界，而日語的獨大也改變了朝鮮的知識體系，日語的協力作品更成為殖民主宣揚國威的最佳載體，並奠立了日本在殖民地的至高優位。⁵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一環，朝鮮方面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開始直到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爆發的十五年間，不僅擔任日本物資上的補給與奧援的角色，文化人們在「皇國臣民化」（皇民化）政策中更身兼重職，被總督府動員為帝國的文化宣傳者。透過日本的皇國宣傳政策可以清楚的窺見，日本於戰爭期間在殖民地所採取的一元化動員方式其背後隱含的帝國主義思想的運作邏輯，當日本急欲建造大日本帝國之際，無論是日本內地或是殖民地的文化人都需背負著文化動員的任務，除了政治上推動帝國的擴展方針外，更期待透過各地文學者的努力從文化建設上落實日本的東亞帝國思想。然而，除了日本單方面的殖民地動員政策之推行外，朝鮮文化人的對應也是不容忽視的面向，特別是多數的在日朝鮮文化人的言動，這些直接聯繫著日本與朝鮮的文化人在戰爭期間的角色與影響，展現出作為殖民地的朝鮮與帝國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筆者認為透過對於日本翼贊邏輯的分析，以及朝鮮作家們對於殖民母國的協力對應等方面的探討，有助於了解朝鮮文化人在文化動員政策與文學書寫之間所隱含的朝鮮思考如何與帝國的大東亞共榮想像結合並且推動的過程。

戰爭期間，日軍初期的連戰皆捷及其勢如破竹之姿，在媒體的宣傳下確實有效的塑造了帝國圖像。值得關注的是，受到此戰爭氛圍的影響，朝鮮內部也興起翼贊協力與「內鮮一體」的口號，特別是「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在殖民主建立的權力系譜下活動的朝鮮文人們，是否企圖在長期的邊緣化中透過協力戰爭以爭取自身的帝國位置，因而對於「東亞再編成」有所期待？第三章中筆者已經就台灣的戰時動員概況與文學者們對於大東亞共榮的應對及認同議題與戰爭期間的創作提出討論，本章一方面試圖釐清戰前的朝鮮與內地文壇的交流情況，一方面將爬梳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朝鮮文壇以及作家與殖民母國之間的關係，探究朝

⁴ 參見朴慶植著《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支配》（上卷），東京：青木書店，1973 年 6 月初版，頁 142-162。

⁵ 1937 年 3 月 17 日，總督府發布徹底使用日本語的通牒制各官署，1938 年 1 月開始，由總督府學務局展開了日語普及運動，同年 3 月 4 日朝鮮教育令改定，中學校的朝鮮課程從必修改為選修科目，1941 年 4 月 1 日國民學校規定廢止朝鮮語教學。參見朝鮮總督府《施政三十年史》，東京：名著出版，1972 年 9 月出版。

鮮的戰時動員、文壇、文化人的文學活動與翼贊思想的展開，特別是朝鮮文人於戰爭期間在民族與文藝協力之間的糾葛，藉以與台灣的文學奉公與大東亞思考相互參照，以釐清日本在其建造的大東亞帝國中東亞文學圈所展現之樣貌。

第一節 帝國與文學：朝鮮作家的殖民之路

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地經營到了 30 年代左右，在總督府嚴格的言論統治及同化政策與各種政令措施下，社會已經產生明顯的變化⁶。除了政治上刻意培養的親日勢力使得朝鮮社會正式的殖民地化之外，從朝鮮王朝時期即開始派遣的赴日留學生也起了相當的作用。1910 年日韓合邦（被日本併吞）之後，這批吸收新知的世代積累成一股龐大的社會勢力，此也意味著有別於傳統文人的「新」知識份子的出現以及「新文學」地盤的形成。⁷雖然日本從佔領之初便在朝鮮刻不容緩的推行國語運動，然而落實上仍有阻礙，一方面朝鮮舊有的知識體系並未因殖民而瓦解，傳統朝鮮儒學在殖民初期仍然是知識份子重要的知識養成來源，一方面雖然殖民政府透過學校教育推行日語普及運動，實際上得到的效果卻有限，從總督府的調查報告中可以得知，1938 年的朝鮮解國語者的百分比僅佔 12.38%，遠遠不及於台灣的解國語者之人數。⁸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透過殖民教育培養出來的一批新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與留日返朝的知識人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知識階層，這群殖民地的朝鮮菁英也成為朝鮮社會的新興力量，承擔了作為殖民地之後的朝鮮與總督府之間的中介橋樑。

⁶ 朝鮮總督府為了攏絡親日勢力，1919 年 7 月公布「親日朝鮮人有力者之利用及保護」，從而培養親日分子以作為對應朝鮮民族運動的對策，分別從貴族、兩班（文班與武班）、儒生、富豪、實業家、教育家、宗教家等各階層浸透，藉以消滅抗日勢力。此舉也達到預期的功效，就知識階層而言，包括大東斯文會、儒教振興會、儒教大道會等儒教相關團體在總督府的民族主義改良思想的誘導下，成為親日團體的一員。同註 2，頁 217-230。

⁷ 在朝鮮的文學發展史上，明治 41 年（1908）以後的赴日留學生可視為主導新文學發展的重要關鍵，這批留學生返國之後所創作的愛國詩作以及散文詩等是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受到明治時期文學的深刻影響，以「時調」為主的新體詩在文壇蔚為風氣，如崔南善、金嵐曙、朴月灘、金巴人、梁柱東等人皆有詩集問世，然而，因為詩作特有的濃厚文藝性無法普及至大眾的緣故，這些近似「和歌」的詩作吟詠對象大多是社會的上層階級。與「時調」詩體同時興起的小說體裁，在質與量上成為朝鮮文壇最廣為流傳的文體，留學生們將所接收到的日本文藝思潮以及新的思想與文藝觀透過小說的中介於朝鮮文壇傳播，也引發了新的文藝風潮。見李光洙〈朝鮮の文学〉，《改造》14:6，東京：改造社，1932 年 6 月出版，頁 204-211。

⁸ 台灣方面在 1930 時的「解國語者」已達 12.36%，1937 年更達到 37.80%，由此可知日本的國語推行運動在兩個殖民地推行的落差。關於台灣方面的「國語」推行，詳見周婉窋〈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收於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2003 年 2 月初版。另朝鮮的「解國語者」統計表，參見朝鮮總督府編纂《朝鮮事情》（昭和 15 版），1939 年 12 月初版，頁 10。

朝鮮的殖民地化到了 20-30 年代呈現了穩定的狀況，總督府以文化統治為訴求的懷柔政策也間接刺激了文藝界，中日戰爭之前的朝鮮文壇也呈現出蓬勃的發展。留日返朝的作家群在日本文學的刺激下，致力於發展言文一致的朝鮮語之創作，並援引日本新的文藝形式與思想進行創作，透過這些新的文學形式與內容的應用在朝鮮文壇引發新的文學風潮，成為朝鮮近代文學的重要啓蒙關鍵。⁹此外，在固有的詩文之外又另闢小說之路增廣了讀者群，並且除了朝鮮文之外，日文書寫作品的出現也使得朝鮮文壇更為多元。這些活躍於朝鮮文壇的文學者們，實際上擔任了殖民時期日、朝之間重要的中介任務，他們成為新知識的傳播者與引導者，這批人在返回朝鮮之際，也將此近代經驗帶回朝鮮，支撐了殖民地時期朝鮮文化輿論界，並在社會中佔有重要的發言位置。一方面受到日本近代化經驗的洗禮，對於朝鮮被日本併吞的原因有了具體的比較檢討，一方面，透過日本的引介也接觸了世界的潮流，與受到傳統儒學薰陶的朝鮮文化人有了不同的思維。然而值得探討的是這些留日知識份子在「認同」上所產生的不一致性，亦即，對日本的近代化認同並不等於國族認同，甚至於受到日本對於民族概念的啓發，這群新的朝鮮知識人在國族、階級與近代化經驗的檢討與超越也有別於前人，是殖民時期朝鮮知識人相當重要的觀察面向，此也影響了朝鮮文化人之思維與文藝表現。透過近代的文藝作品之表述，文學者們道出內地人與半島人身份上的不對等之悲哀，並且深刻的面對朝鮮的文化與殖民主帶來的近代的文明之間的消長議題。他們既對於自身民族受到的殖民處境有所不滿，又無力抵抗殖民主加諸的近代化經驗，這種複雜的認同心理也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們在抗爭與屈從之間擺盪、矛盾從而也表現在其作品之上。

本節期待透過對於朝鮮文壇的新文藝思想的探討，進而一窺因殖民帶來的近代經驗而造成的社會轉變以及「新」的知識階層對於文學的新嘗試。又，朝鮮在作為「他者」被內地文學者書寫展現之際，朝鮮自身的文學者們又如何以日本語來書寫自身前進內地文壇？此議題有助於進一步理解朝鮮在戰爭期間的協力關係，從中也可窺見朝鮮的文學者們在「新」經驗中與當局者所建立的互動社會體系，以及對於朝鮮的過去與未來進路之思考。

⁹ 在韓國文學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多位文學者，包括了朝鮮新體詩的創始者：崔南善、近代小說的創始者：李光洙、近代短篇小說的完成者：金東仁、新小說創始者：李人植以及近代詩的創始者：朱耀漢等人，在其留學過程中受到日本文學深刻的影響，返國後陸續完成了朝鮮的近代文學之改革。參見南富鎮《文學の殖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京都：世界思想社，2006年1月初版，頁77-78。

一、殖民・近代化・朝鮮文壇

朝鮮在淪為殖民地之後面臨了近代的巨變，資本主義的進入與產業的發展改變了原本的生活型態，代表近代國家象徵的「國語」也積極透過教育體制的建立傳遞至殖民地，此番的社會變動也引發了朝鮮文壇的「近代」改革。從殖民地的建立之初起直至日本敗戰為止，日本為了確保自身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以及在朝鮮的資本利潤有意從文化層面與同化政策著手，企圖淡化民族與階級對立的矛盾。鑑於朝鮮民族總動員的「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新殖民的日本統治者察覺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積極構築所謂的「協力機構」，從各方面來支撐總督府的統治策略。1910年以來所採行的透過朝鮮舊皇帝、皇室、兩班、軍人及地方士紳這股舊有的統治形式進行折衷妥協的「武斷統治」在「三・一運動」後宣告徹底崩解，由於期望依賴安定朝鮮治安的朝鮮傳統治理體系的崩解，朝鮮總督齋藤實於1919年8月施行所謂的「文化政治」，¹⁰期待透過此懷柔政策重新建立新的統治機制，以緩和存在於朝鮮社會中的「民族」對立問題將朝鮮徹底的殖民地化。就政治上而言，雖然一面對於反帝抗爭的民族主義者進行抗壓，但一方面也積極推動對鄉紳地主階層的體制內化之懷柔政治工作，此舉對於總督府的統治安定產生了相當的效果，實際上，殖民政府所帶來的近代化系統，如土地制度、商品經濟資本的導入在殖民地宣示了其統治的有效性並得以確立日本的國家霸權，此外，總督府與朝鮮的新興地主階層之間的斡旋與折衝合作也造成了「親日派」集團的出現，意即，殖民帶來的近代化改變了朝鮮社會的封閉性進而使得這些殖民地有權者與殖民當局有了合作的契機，並且對統治的總督府而言，這股來自於殖民地的協力力量有助於殖民地的穩定以便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

除了培養親日的團體外，另一方面當局也透過教育的改革來進行殖民地的規訓改造，企圖透過教育系統來養成殖民意識，從教科書中輸入日本的文化資本藉以取代傳統朝鮮的文化。例如：第二次的朝鮮教育令中頒布：普通學校6年，高等普通學校5年，總督府透過教育的改革建構與日本本國相同的教育制度，企圖營造出一體的效果，此外，共學制度的推行也是緩和朝鮮人與內地人對立的方

¹⁰ 所謂的「文化政治」，一是廢除任用武官為總督的限制，文官也可擔任此職，並廢止憲兵警察制度改為普通警察制度。再者，官員、教師裝扮的改變，不再穿著制服與配劍，朝鮮人也能擔任官職，此外，緩和言論之管制，允許朝鮮人發行自己的報紙，普及教育，表面上看來是對於歷來嚴密的殖民地控管的鬆綁，雖然限制較為緩和，實際上殖民地的朝鮮民眾在社會階位上並無實際的提升，此可視為朝鮮總督府的一種衝突緩衝政策。參見朝鮮總督府著《朝鮮總督府施政三十年史》，東京：名著出版，1972年9月出版，頁134。

策，總督府令第 15 號中雖然限制朝鮮人學生不能超過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但承認日本人與朝鮮人的共學，此舉揭示出總督府想營造出「內鮮一體」的期待，並在此教育系統中從殖民的角度誘使被殖民的朝鮮民眾認識自己，從而認同殖民者的價值判准。爲了堅固自身的文化規訓機構，總督府更提出「三面一校計畫」企圖增設普通學校，1924 年更設置了京城帝國大學，對殖民地的教育推行而言，至此已大體臻於完整。¹¹就作爲「協力機構」構築的一環而言，日本透過建立近代化的學校制度能夠達到馴化的效果，進一步完成文化統合的要求，對於日本的殖民地改造與統治有極大的助益。此種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著眼的「協力機構」之建立，在 20-30 年代之間也有有效的幫助總督府的殖民地經營，並且也是日本轉向大東亞之際一個重要的翼贊力量。

朝鮮的新文藝運動與政治、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20 年代左右接受殖民教育養成的新社會階層取代傳統士族階層支撐了新文藝運動的推行，同時也成爲宣導新思想的有力奧援。爲何朝鮮新文藝運動在 1919 年以前無法全面展開呢？筆者認爲可從兩個方面來討論，首先是空間的不足，文學者們缺乏可供承載其新文藝主張的報刊，無法系統性的宣導。由於統監統治時期與武斷統治時期的朝鮮嚴格限制言論集會與報紙、雜誌的刊行，在此時期朝鮮多數的雜誌報紙皆被總督府認爲具有反日、民族的色彩而予以停刊，除了《京城日報》、《每日申報》（朝鮮文）、《ソウル・プレス》（英文）與《朝鮮公論》、《朝鮮及滿洲》等總督府御用的報紙、雜誌外別無他家，更遑論自由的結社活動。¹²此外，讀者群的限制也影響了其發展，接受傳統書房教育的知識人除了儒教之外，文學趣味上還是偏向漢詩、諺文、時調一類的作品，一般的小說讀者則喜好才子佳人、神秘傳說以及古代人物故事，就當時的文壇而言，對於新文藝思潮抱持興趣的文化人還相當少數，此時期的朝鮮文壇可以說尙處於封閉的階段，儘管留日學生已經開展了新文藝的創作並欲傳遞新的文藝思想，然而，可供寫作傳遞新文藝的社會階層卻還未成熟。直至 1919 年，朝鮮社會面臨重大的三·一運動事件，總督府在朝鮮施行的文化政治，允許朝鮮人發行報刊雜誌直接帶動了朝鮮文壇的活躍，加上自 1910 年推動的殖民教育已在殖民地社會培養一批「新」的知識階層，年輕的新文學者與已近中年的留日文學者們的結合也帶動了新文藝思潮的興起。

¹¹ 參見幣原坦〈朝鮮教育論〉，收入渡部學、阿部洋編《日本植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朝鮮篇）》第 25 卷，東京：龍溪書舍，1991 年出版，頁 127-128。

¹² 參見朴慶植《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支配》（上卷），同註 4。

近代朝鮮文學的進展與留日學生也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由於朝鮮的文學者們與台灣文學者的殖民經驗不同，文學的接收與展現也與台灣的新文學發展有所差異，與台灣相比，朝鮮文壇的近代文學的發展受到日本的影響甚深。戰前，台灣方面與中國之間的往來頻繁，特別是知識份子們在文化認同上混雜了中國與日本而發展出台灣的特殊文化樣貌，在中日戰爭之前，文學養分的吸收上一直都呈現雙軌方式，一面是中國的養分，一面則是日本的養分，台灣的留日作家們雖從日本引進新文學的元素，另一方面卻也受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啓蒙影響，部分不諳日文的漢文作家世代也從事白話文的新文學創作，可以說，20-30年代間的台灣文壇夾雜了漢文、日文與白話文，發表作品也相對多元，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也可視為此雙軌吸收下的具體成果。相較之下，朝鮮的新文學之刺激直接從日本援引而來的養分較多，朝鮮有名的普羅文學評論家林和對於朝鮮近代文學的形成過程曾指出：「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新文學生成期最重要的問題，即就言文一致的文章創造而言，朝鮮文學完全是由明治文學所移植而來。」¹³由此可見，要論及朝鮮的近代文學不能忽略與日本文學之間傳承與互動的移植關係。朝鮮近代文學的起源與明治時期的文學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主要的推手便是來往於兩國之間的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從日本援引而來的明治文藝思潮挹注朝鮮文壇近代文學的養分，特別是明治文學中的日本語所表現的言文一致之敘事，刺激了文學家們思考朝鮮文學中言文不一致的弱點，進而以此為模範促進朝鮮文學的改良，金東仁就在小說中以口語體（白話文）來創作，展現了近代的文學觀並奠定了朝鮮語的近代文學基礎。進入殖民期後，在日本的朝鮮留學生一方面目睹朝鮮殖民地化的轉變，一方面卻也在日本文學的刺激下接受了世界的新文藝思潮，特別是對於朝鮮過去封建意識型態的思考有了較全面的省思，透過文化層面企圖以文學創作在有限的殖民地空間中呈現其對朝鮮文學的思考。關於朝鮮文壇新文藝運動的發展從最初1910年以後到1919年之間可視為其萌芽期，文學者們透過日本的中介嘗試了新文學作品的創造，在形式與內容上都展現出與過去舊文學不同的樣貌。1919年到1923年間為文學的摸索期，文學者們對於文學究竟要走上藝術至上或重於揭露現實的普羅文學之路有了歧異並為文討論，到了1923年到30年代初期，受到日本國內普羅文學主義的影響，直至30年代初期為止討論階級的普羅文學也成為文壇的主流。就整個文學發展的過程來看，朝鮮作家的文藝活動主要圍繞著

¹³ 見林和〈新文学史の方法〉，收入《文学の論理》，東京：學藝社，1940年。

階級與民族兩個命題，¹⁴對於朝鮮的新文藝運動而言，留日學生帶動了 30 年代文壇的興盛並扮演了重要的傳遞角色，如：李人植、李光洙、崔南善、朱耀翰、廉想涉等人他們帶著新文藝思潮回到朝鮮從事文藝運動進而推動了新文學。

日本的朝鮮留學生數量在進入統治期後大增，¹⁵從日本東京朝鮮留學生學友會的機關誌《學之光》的統計表中可以窺見，自 1897 年到被合併的 1910 年為止，留學生人數由最初的 310 人遽增至 800 多人，這些人在日本結成了多個留學生團體，並發行機關誌，至 1910 年約有 10 個以上的團體在日本活躍。雖然留學生團體主要以民族保衛運動為主，然而在機關誌中也不乏有文藝作品的出現，後由於日韓合併之故被強制解散，但是經由朝鮮留學生所傳遞的文藝思潮之累積卻也成為開啓日後朝鮮近代文學史的重要養分。¹⁶《學之光》為朝鮮語雜誌，於 1914 年 4 月創刊，此份雜誌在朝鮮言語受到限制壓抑的武斷統治時期成為朝鮮知識分子重要的發表園地，此雜誌上發表的留學生們日後也都活躍於朝鮮學界、文學界、教育界、宗教界、政界等各方面。就文學界而言，李光洙也曾在評論欄上發表對於朝鮮封建的婚姻制度的不滿，提倡戀愛的必要性，另外，田榮澤、李益相、崔成九等人也都活躍於其中。在文藝方面，《學之光》提供文學者們試作自由詩的園地，他們唾棄道學的腐儒，反對盲從古人的文型、舊句，希望打破已經毫無生命力的詩、歌、文。金興濟曾發表〈山女〉、〈ひとつの終わり〉（一個結束）、〈眠りに就く時〉（想睡的時刻）（1915），李光洙也發表了〈極態行〉的長篇詩。另外，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上，作家們採取以日文書寫的言文一致體，表現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在主角人物以及背景上擇取朝鮮的事物，另一則是留學生們以自己為主角描寫自己的生活或是日本人兩者的表現上大有不同，前者成功的作品如崔素月〈南朝鮮の新婦〉（1914）、小星〈清流壁〉（1916）等，後者有瞬星〈叫び〉（呼喊）（1917），這些文學者們對於新文藝的創作嘗試表現雖然尚未成熟，然而卻也表現出文學者們對於朝鮮文學的改造心態，從中可以窺見其對朝鮮近代文學發展的期待。失去了國家的朝鮮文化人在見識日本的近代文明之後，意識到日本的殖民建設正是要複製其自身的文化加諸於朝鮮，朝鮮文化也終可能淪為次等的被淘汰的命運，這些留日文學者們在《學之光》中所努力的正是對於朝鮮新建設

¹⁴ 參見八峰學人（金基鎮）〈朝鮮文藝變遷過程（1）〉，原載《朝鮮思想通信》，1927 年，收入大村益夫、布袋敏博編《近代朝鮮文學日本與作品集 1901-1938 評論・隨筆篇 1》，東京：綠蔭書房，2004 年 10 月初版，頁 161-194。

¹⁵ 1937 年 10 月 1 日以前，日本內地的朝鮮學生人數為 7598 名，在東京的就有 5734 名。見朝鮮總督府編纂《朝鮮事情》，昭和 13 年（1938 年）12 月 27 日出版。

¹⁶ 統計表參見《學之光》6 號，東京：在日本東京朝鮮留學生學友會，1915 年 7 月。

走向的探索，感受到日本文化的文學者們在東洋文化的根源--日本直接汲取其豐盛的文藝養分，並融合自身的表現新技巧與朝鮮觀點的內容，進而也得以創作屬於朝鮮的文學與日本文學者們所寫作的「朝鮮」呈現了不同的視野。¹⁷1919年2月，以東京留學生為中心的朝鮮學生設立了創造社，並發行同人誌《創造》，朱耀翰為創刊的編輯兼發行人，3號-7號的編輯兼發行人金換，8號-9號的編輯兼發行人為高敬相，此為近代朝鮮最初的文藝同人誌，最初的同人成員有：金東仁、朱耀翰、田榮澤、崔成萬、金換五人，之後在加上金觀鎬、金億、金瓚永、李光洙、李一、吳天錫、林長和及朴錫胤等人。從1919年創刊到1921年終刊共發行9號，主要在朝鮮發行，讀者也多為朝鮮人。值得注意的是《創造》的發行時機，正是三、一運動的前夕，金東仁在〈文壇三十年史〉中回憶提出：

留學生們計畫發行《創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對於朝鮮的文學與出版狀況的不滿。當時朝鮮內部可以發表言論的場所相當稀少。在報紙方面，自1910年8月10日「韓日併合」之後，將《大韓每日申報》、《大韓民報》、《皇城新聞》、《大韓新聞》中的其中三個新聞強制廢刊，將僅剩的《大韓每日申報》改題為《每日申報》，作為總督府的機關報發行。雜誌方面，雖有崔南善創刊了《少年》(1908年11月-1911年5月)、《青春》(1914年10月-1918年8月)，但都以一般教養為目的。文學方面以西洋的翻譯小說、笑話、奇談為中心，其他部分，只有以西歐文學的翻譯、介紹的旬刊報紙《泰西文藝新報》(1918年9月-1919年2月)而已。¹⁸

由於是以日本作為編輯的據點，因此比起在朝鮮進行編輯工作限制較為寬，日本當局對於刊物的雖然仍採取嚴格的檢視工作，但在不涉及民族獨立或反日之思想便給予刊行，給了朝鮮文壇一個改革的生機。在《創造》的帶動下，陸續也有多個文藝誌創刊，如洪永厚編集的《三光》、張膺震編輯的《曙光》皆在同年誕生，這些文藝誌上發表的文章範圍相當廣泛，分別有詩、小說、散文、評論等部分。就《創造》而言，文學者們志於創作出有別於朝鮮的「新小說」與啓蒙主義

¹⁷ 受到日本「征韓論」的影響，「朝鮮」作為一個冒險的圖像受到日本文人的關注，並開啓了對「朝鮮」的描寫。關於日本人以朝鮮為題的文學作品，著名的有：夏目漱石《滿韓漫遊》(1910)、石川啄木短歌作品《朝鮮国のうた》(1910)、高濱虛子《朝鮮》(1911)、森鷗外《佐橋甚五郎》(1913)、中西伊之助《不逞鮮人》(1922)、《汝等の背後より》(1923)、《国と人民》(1926)，此外，柳宗悅從朝鮮藝術的審美角度也寫作相當數量的文章。參見朴春日《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朝鮮像》(增補版)，東京：未來社，1985年8月初版。

¹⁸ 此為金東仁以韓語書寫的文壇回憶錄，本文轉引自任展慧的日文譯文。見《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の文学と歴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4年1月初版，頁88-89。

的新文學，藉以對抗對於文學尚無理解的朝鮮社會，一方面否定只要求趣味性的新小說的通俗性，一方面也批判具有功利性的啓蒙文學，意即，這些同仁作家們期待透過《創造》來創造藝術，他們受到自然主義文學的文藝思潮的感染，為朝鮮文壇導入了寫實主義，對朝鮮近代文學的發展貢獻極大。

筆者認為日本文明開化之後在亞洲所展示出的「近代」樣貌，正是其吸引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最大因素，由於對於近代的憧憬，提供了日本進入殖民地最佳的入口。身為統治者的日本，儼然成為世界近代知識的供給站，是提供殖民地吸取歐美文藝新知的窗口，但同時也是個掠奪者，對於殖民地進行壓迫與榨取，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對於統治者的兩面性也抱持著矛盾。隨著日本殖民逐漸進入體制化之後，殖民初期的文學者們在對應上也逐漸有了視野的歧異。這種歧異可從文學者們在殖民初期對於日本統治與朝鮮文壇的思考與 30 年代出現的接受日本殖民教育薰陶的一代的朝鮮思考窺出不同的思維方向，此也明顯的揭示出與台灣相同的殖民世代的內化問題，表露了帝國與文學者之間複雜糾葛的關係。¹⁹

二、前進東京：朝鮮作家的內地文壇進出

朝鮮在殖民初期由於受到總督府在言論與結社自由上的打壓，因而文學者們藉著文藝活動的展開也得以在封閉的殖民社會中發出聲音，此也成為朝鮮文化人從事文學活動的契機。對於殖民初期的文學者而言，其思考的邏輯是一種內向的視野，意即，他們所思考的改變是以朝鮮作為客體的思想，即使援引了日本或歐洲的文學素材，最終還是以本國文藝的改善為目的。朝鮮近代文學創作初期歷經了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思潮洗禮的黎明期，1919 年以後，文學作品數量的增加及閱讀階層的出現支撐了文學活動的發展，以朝鮮語為媒介的文學創作上有了相當豐富的成績，在小說與詩作上皆有突出的表現，廉想涉的作品以長篇為主，題材主要探討了朝鮮社會沉重的人生處境，代表作品有：〈標本室の青蛙〉、〈向日葵〉、〈萬歲前〉、〈F 先生〉、〈忘れられない人々〉、〈牽牛花〉、〈孤獨〉等。李光洙以文筆華麗，多產聞名，特別是在長篇方面多有佳作，著名的如：〈無情〉、〈開拓者〉、〈許生傳〉、〈先導者〉、〈再生〉、〈五道踏破記〉、〈金剛山遊記〉等。

¹⁹ 關於殖民世代 (generation) 差異之議題的提出提供了探究殖民地對日的協力議題，無論是殖民史五十年的台灣亦或是三十五年的朝鮮，都可窺見世代間價值變化的軌跡，也揭示出殖民地的世代間可能產生的認同之「灰色地帶」，給予戰後被汗名化的親日、媚日的殖民地日語文學作品重新審視其中複雜性的可能。相關論述可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前揭)、並木真人《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前揭)、南富鎮《文学の殖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前揭)。

此外，包括了玄鎮健、羅彬、田榮澤、金東仁、閔泰瑗、朴英熙等人也都在小說方面有所表現並獲得肯定，至於詩的創作上，崔南善、朱耀翰、朴月灘、金素月、趙明熙、金東煥、梁柱東等人的作品也得到廣泛的迴響，透過這些留日文學者的努力使得朝鮮的近代文學得以邁入成長期。1920年以後的朝鮮文壇出現巨大的變化，可以說呈現出多元發展的蓬勃氣氛，一方面，雖然以李光洙、朱耀翰等人為首的浪漫派的布爾喬亞文學思想仍具有文壇勢力，但受到大正民主時期盛行的左翼思潮的影響，描寫無產階級為主的普羅文學成為文壇的主流。另一方面，日本語創作的出現，也成為朝鮮文壇一個新的文學領域。

在左翼運動的發展上，朝鮮的左翼文學者們與在日的朝鮮左翼人士結合開展了朝鮮人的左翼運動，1925年8月的「朝鮮プロレタリア芸術同盟」成立，簡稱「カッパ」，其成立的宗旨在於認定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必然性致力於推動無產階級運動，因而作為無產階級運動一部分的無產階級藝術運動而言，首要必須排擊封建以及資本主義的觀念，其次是要與專制的勢力抗爭，藉以培養意識型態的完成。日本方面，1927年東京的留學生韓植、李北滿、洪僥民、高景欽等人在日本成立組織了文學團體「第三戰線社」並發行機關誌《第三戰線》，其創社的目標為主要是要向朝鮮傳播普羅藝術運動，在視野上仍然承襲筆者前述的內向思考，也就是以朝鮮的改變為主的思索模式，李北滿在〈朝鮮の芸術運動--朝鮮に注目せよ〉一文中明白的揭示：

在所謂的殖民地朝鮮所展開的普羅藝術運動，深具了許多在內地（日本）所無法窺見的重要意義，這種特殊中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暴壓」問題。朝鮮究竟是處在何種暴力之下呢？關於這些以後會有很多人控述吧。這種控述的聲音馬上就會震撼百萬人的心靈，這樣也才能夠開口生動的訴說朝鮮的藝術²⁰

從文章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身為殖民地文學者的李北滿在接受日本左翼思想的薰陶之際，對於殖民暴力的覺醒，也就是藉著左翼運動來檢視隱藏於近代文明之下的殖民暴力議題，並且希望以此喚醒朝鮮民眾進行對統治者的抗爭爭取殖民地人民的尊嚴與對等，以及確立對自身文化之認同，可以說，直至日本尚未進入戰爭態勢的30年代初期，有關殖民的近代與暴力之間的關係之辨明也成為朝鮮的左翼文學者們思考的重點。關於朝鮮左翼運動的系譜，它不僅是在朝鮮的獨立活動，同時也是內地、朝鮮的文化人們共同的活動，朝鮮的左翼運動社團與以日本文化

²⁰ 見李北滿〈朝鮮の芸術運動--朝鮮に注目せよ〉，《プロレタリア芸術》，1927年。

人爲主的左翼運動之間也保持著互動的關係，1927年10月「第三戰線社」宣布停止活動，其原來的成員加上金斗鎔、張準錫、崔炳漢、李景鎮、辛口柱等人成立「カップ」的東京支部，設立東京支部的最大原因主要是爲了對應總督府對於殖民地出版刊物的嚴格制限，因此同年11月「カップ」的機關誌《藝術運動》在東京發刊，創刊號上收錄了對於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指導大綱，另外還刊載朴英熙〈無產階級文藝運動の政治的役割〉、中野重治的〈日本プロレタリア藝術聯盟について〉，此外還有尹基鼎、趙重滾的小說以及林和的詩等作品。此外，1929年5月由金斗鎔、李北滿、成者伯等人成立了「無產者社」，發行朝鮮語機關誌《無產者》，同年的11月「カップ」東京支部宣告解散與「無產者社」合流。這是有鑑於「カップ」東京支部的宣傳機關誌《藝術運動》因爲支部力量的薄弱而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因而重新組成了嶄新的團體，期待以《無產者》從事藝術方面的抗爭，並直接向勞動者、農民訴求進而使得與朝鮮一樣的殖民地得以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妨礙與壓迫。然而，在從事藝術鬥爭的過程中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鬥爭也持續的進行著，因而文藝創作反而付諸闕如，相反的，在朝鮮的文學家們，如韓雪野、趙明熙、李箕永、宋影等人在1927-1930年間以朝鮮的人民爲背景，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優秀普羅文學作品。朝鮮的在日文學者們在日本成立的「無產者社」最終還是在日本政府的取締壓迫下解散，其中的部分成員也被送返朝鮮，至此，朝鮮文學者們於日本的獨立左翼運動也遇到了極大的瓶頸與困難，一部分是自身在路線上的分歧，對於是要走階級路線或是民族路線有了不同的見解，造成內部的矛盾，另外，日本政府的壓迫也影響了其發展。

1931年11月，在朝的文學者們集結了之前各社團的成員，以金斗鎔、李北滿、李燦、朴玄釗、金寶鉉等人爲中心的「同志社」宣告成立，成爲在日朝鮮文學者們最大的藝文團體。其組織共設有作家、演劇、映畫、音樂、美術等五個部門，成員方面可以說含括了所有在日的朝鮮文化人，其創立宣言是以朝鮮語、日語兩種語言發表，和以往成立的藝文社團相比，「同志社」擺脫以往將朝鮮作爲唯一中心的作法將在日本的勞動者也納入視野，這種視野的擴大與轉換實際上具有極大的意義，一方面文學者意識到自己的現實處境同時也確立了自己「在日朝鮮文學者」的主體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同志社」的文化人們也以作爲朝鮮與日本的普羅文學與藝術活動的媒介自許，也就是作爲一個「中介」的角色，將兩地的普羅文化運動結合以發揮更大的力量，在此同時，將普羅文化運動提升爲國際的運動方式，將日本的另一殖民地：台灣也納入了思考，組織內設置了「朝鮮・

台灣委員會」主要鼓勵支持依據朝鮮、台灣其獨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其獨特殖民地文學，實際上是對於殖民地民族文學獨立性的思考。²¹除了在日朝鮮文學者的普羅藝術運動外，1928 年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ナップ (NAPF) 的成立，以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左翼作家發行了機關誌《戰旗》，朝鮮作家的創作也出現在此左翼雜誌中，金英根的朝鮮語小說〈苦力〉經由李北滿的翻譯轉載於《戰旗》1 卷 7 號上，此外，李北滿、金星波、金重政、金斗鎔、李生、金光均、韓鐵鎬等人也在《戰旗》上發表了社論與書簡，左翼作家們將視野置放於勞動者與農民之上，進而凸顯了階級之間的矛盾問題乃至於民族間的支配格差問題，1931 年 11 月ナップ併入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コップ (KOPF)，發行機關誌《プロレタリア文化》，同時，至此為止都獨立運作的在日朝鮮人普羅藝術團體「同志社」於 1932 年 2 月宣告解散，併入コップ成立「朝鮮協議會」。然而，「同志社」納入コップ之中原本是期待透過コップ的網絡將普羅文化運動朝向更為國際化，進而支撐殖民地各民族的獨立文化、語言的發展，實際上卻有了相悖反的結果。コップ (KOPF) 對於被壓迫的民族之文化的見解為：

我們的終極目標在於揚棄民族文化，樹立國際文化，決不是民族文化的建設。但是關於此事，現在的帝國主義文化並不是壓制弱小民族，反而是促進民族文化的自由發展。²²

對於受日本統治的他民族而言，コップ忽略了民族的個別性問題以及對於反日帝的視角的不同，此也成為日朝的普羅文學者們矛盾的起點。「コップ・朝鮮協議會」細分了多個同盟組織，包括了演劇、音樂、作家、世界語、寫真、美術等部門，並發刊《ウリトナム》機關誌（朝鮮語），由金斗鎔、金龍濟、朴玄釗、李洪鐘等人擔任編輯成員，以コップ的機關誌《大眾の友》的附錄形式發行，也藉以吸引無法閱讀日文的大眾使其得以閱讀相關的文藝作品與報導，以此作為日本與全朝鮮的勞動者、農民的啓蒙誌。然而，如前所述，以在日朝鮮文化人為主的「朝鮮協議會」在コップ各聯盟中對於殖民地政策的不同視野在意見產生了分歧，究竟是發展國際主義或是走向民族主義，成為其內部的爭論焦點無法得出定論，加上 1933 年《ウリトナム》的全體編輯成員受到日本政府的取締，因而在同年 8 月發行了終刊號，1936 年，日本政府意識到左翼團體具有的顛覆的危險性，加上

²¹ 參見宮本百合子〈年譜〉，收於《宮本百合子全集》15 卷，東京：河出書房，1953 年 11 月出版。

²² 見〈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連盟の任務〉，《プロレタリア文化》12 月號，1931 年 12 月。

右翼勢力的抬頭，在確保帝國的優位與穩定下，實施了嚴厲的取締活動，在日本的朝鮮人在「朝鮮藝術座」被取締之後也宣告左翼文化及文學活動的結束，「朝鮮語」作為普羅文學中介文體的嘗試在日本最終也以失敗結束，而以日本語進行書寫的朝鮮文學者逐漸取代了這些左翼文化人的角色活躍於日本文壇。

透過上述的左翼思潮在朝鮮與日本的展開的過程，可以大概掌握普羅文學作為一個時代思潮對於 20-30 年代初期的文學界的影響，以及朝鮮文學者們企圖以朝鮮語在帝國的文藝編制中尋求對等性的努力。相較於以朝鮮作為視野的文學者們的民族立場與心態，以日文作為書寫工具，志於前進日本文壇的朝鮮作家的心態值得進一步探究，筆者想討論的不是關於作家們對於帝國的抵抗與認同這種對立切割的兩種關係，而是試著從戰前的朝鮮文壇的動態與發展來檢視朝鮮作家們與帝國的複雜互動，從而理解殖民地作家在面對帝國文化霸權之際，夾雜在反抗與認同之間的灰色地帶。究竟戰前朝鮮作家的日語創作是否製造一個進入內地文壇的契機？透過與日本文壇的互動，朝鮮作家企圖透過創作在內地與朝鮮之間達到何種效果，值得審思。關於朝鮮人的日文作品之出現，最早是 1902 年由當時在日本都新聞社當見習生的李人植發表於《都新聞》上的〈寡婦の夢〉為嚆矢，1909 年，當時還在明治學院留學的李光洙也在同窗會報《白金學報》上發表〈愛か〉，之後陸續有在日的朝鮮留學生以日語發表作品，特別是在普羅文學盛行的 20 年代，鄭然圭於 1922 年 6 月《藝術戰線》發表短篇小說〈血戦の前夜〉，韓植也在 1927 年《プロレタリア芸術》8 月號發表了〈飴売り〉，另外金熙明也在《文藝戰線》9 月號上發表〈笞の下を行く〉（在鞭笞下前進），〈飴売り〉及〈笞の下を行く〉兩篇小說將朝鮮的現實傳達給日本人，並描寫了在日本生活的朝鮮人的現實與生活，此種文學表現也成為在日本的文學者們日後主要的創作題材。如朴能於 1932 年發表於《プロレタリア文學》9 月號上的〈味方〉就描寫了在本生活的朝鮮人閉鎖的生活狀態，以及在這種生活中萌芽的奴隸根性，只要能夠溫飽就算是卑怯的生活也可以的犬儒心態，此外，與之前的民族主義文學者最大的不同是文中所透露出想與日本勞動者共同攜手抗爭的思想訊息，意即，將階級問題凌駕於民族之上的思想轉變，在日文書寫的普羅文學作品中多呈現出此種視野，筆者以為，因為中介語言的轉換所造成的思想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日本書寫的以日人為讀者的小說，以階級取代民族的呼籲更有可能喚起日本民眾的同理心，因而朝鮮作家將突顯階級對立的議題作為一種書寫的手段，進一步也較可能達成在日朝鮮人所呼籲的提升社會待遇之訴求。

就日語寫作而言，李人植與李光洙等留日學生是朝鮮日本語文學寫作的開端，同時也是朝鮮近代文學黎明期的奠基者，李人植於歸國之後致力於新小說的創作並活躍於文壇，李光洙於 1917 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無情〉²³也奠立其在朝鮮近代文學的創始地位。朝鮮成爲日本殖民地之後，在總督府全力整備殖民制度下，文壇的日本語的創作數量比合邦之前急遽的增加，檢視 1910 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前的朝鮮文人之日本語作品，可以發現文人們欲透過日本語的作品來顯示日朝關係各種樣貌的企圖，如前所言，殖民初期的日本語作品是由留學生開始發表，如鄭然圭、金熙明等所謂的「在日朝鮮人文學」佔了日本語作品的大半，在日朝鮮人的文學作品也成爲朝鮮作家介入日本文壇的一個重要路徑，由於留日朝鮮文人的努力，雖然朝鮮的殖民時期比台灣較爲短暫，然而朝鮮作家的內地文壇進出卻比台灣文學者進入內地文壇的時間更早。²⁴除了在日的朝鮮文人在日本文壇的活躍外，在朝鮮文壇活躍的文學者也以參加徵文比賽企圖進入內地文壇，朝鮮文壇在 30 年代之前以朝鮮文的文學創作為主流，一直到 30 年代之後才出現較爲成熟的日語作品，殖民地的朝鮮文學者第一位獲得日本文壇肯定的是張赫宙，他於 1932 年以〈餓鬼道〉入選日本《改造》雜誌第五回懸賞，進入日本文壇，成爲日本文壇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朝鮮作家之一。此外，金史良、李石薰、鄭人澤、洪鐘羽等小說家與金鐘漢等詩人之作品在日本內地文壇也佔有一席之地。

張赫宙得獎的作品〈餓鬼道〉，以慶尙北道的貧農們爲主角，透過水門工事的整治過程暴露殖民政府與地主階層對於貧農們的剝削，從民族的、階級的方面控訴貧農所受到不正當的對待手段以及殖民地的絕望現狀，內容相當具有震撼性，充滿強烈的普羅文學色彩。此篇小說之所以在內地文壇得到重視原因，一部分是符合了當時文壇的普羅文學思潮，另外，1932 年 3 月，也就是小說發表的同時，日本的普羅文化聯盟在政府壓迫檢舉活動下面臨了無退路的窘境，此也成爲作品得以進入內地文壇的契機。張赫宙以告發殖民地現實與不公的小說內容成爲日本普羅文學最佳的替代品，如此一來也提供日文造詣尙嫌生澀的殖民地作家一個進入內地文壇的絕好機會，透過對於殖民地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之揭發描寫也提供殖民地作家們一個進入內地文壇的創作窗口與路徑，如，台灣楊達的〈送報伙〉與張赫宙的〈餓鬼道〉都是基於普羅思想之文學作品。關於殖民地日文作

²³ 此作品是李光洙於早稻田大學就讀時期所創作，並在《每日申報》上連載。

²⁴ 台灣作家進軍內地文壇的嘗試，一直到 1934 年楊達以〈送報伙〉入選《文學評論》10 月號才宣告成功，之後，1935 年呂赫若以〈牛車〉入選《文學評論》2 卷 1 號，同年，張文環也以〈父親的臉〉入選《中央公論》徵文佳作，然而台灣作家的內地文壇活躍度不及朝鮮作家。

家在內地文壇的登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使用的語言工具—日文，日文作為日本近代文化霸權的象徵，特別是在殖民地的語境下，它是一個殖民統治者用來區分「他者」最好的識別工具，也是一個鞏固自身權力最好的昭示。利用「國語」進行殖民地馴化工作的殖民主們，以「國語」奠定了殖民地的近代化制度，同時也養成了一個特定的統治階層。作為殖民地菁英的文學者們何以選擇以統治者語言的「日文」進行書寫呢？從殖民歷史來檢視，可以知道日文隨著殖民時間的增長以「國語」的強勢位階進入到朝鮮文壇，甚至於到了 30 年代以後，日語文學呈現增長的趨勢，有別於過去留學生們對於日語的使用心態，此時期出現的新生代作家們開始抱持著以日語作為直接書寫工具的心態與決意，如張赫宙、金聖珉以及李石薰、金史良等人。²⁵張赫宙對於自己使用日語書寫的用意明白的說道：

世界上像朝鮮民族這麼悲慘民族其實很少，（中略）我還是很想把這種實際的情況告訴世界，但是我如果以朝鮮語來訴求的話範圍就很狹小，關於這點，因為日本語被翻譯成外國語的機會很多，所以無論如何我還是必須要進入日本的文壇。

²⁶

張赫宙正視到了作為殖民主公用語的日語，相較於作為殖民地方言的朝鮮語其流傳較廣的功用性，然而除了作家們強調的功用性外，實際上作為「他者」被矮化的殖民地之民族要取得發言權有其困難性，最理想的方式是與權力中心的交流，也就是透過日文的使用與書寫進入內地文壇，從而取得自身在殖民地的穩當發言權，進而將其最「本土化」的殖民內在透過「國語」的近代機制傳遞出去，以喚起對殖民地處境的關注。然而與殖民主的斡旋過程以及擔負殖民主與族人中間者的文化人們，在利用殖民近代化系統的同時有可能面臨被融入此近代建構的危險性，因而產生認同的傾斜，張赫宙、李石薰、金史良等人的內地文壇進出宣告了以日語書寫的年輕一代文學者們的出現。南富鎮在討論朝鮮的日語文學時援用了林和提出的「移植文學史」的說法，進而提醒看待朝鮮日語文學者必須注意的面

²⁵ 張赫宙除了〈餓鬼道〉之外，刊登於《改造》上的小說尚有：〈追われる人々〉（1932.10）、〈権という男〉（1933.2）、〈一日〉（1935.1）、〈墓参に行く男〉（1935.8）、〈月姫と僕〉（1936.11）、〈路地〉（1938.10）、〈密輸業者〉（1940.5）。另外，1933 年 1 月由保高德藏創刊的同人誌《文藝首都》也是朝鮮作家發表的重要園地，張赫宙發表的小說如下：〈兄の脚を截る男〉（1933.5）、〈奮ひ起つ者〉（1933.9）、〈女房〉（1934.1）、〈山犬〉〈ヌクテ〉（1934.5）、〈あらしひ〉（1935.5）、〈狂女点猫〉（1936.3）、〈或る時期の女性〉（1936.11）。金史良也在《文藝首都》上發表了數篇小說：〈光の中に〉（1939.10）、〈土城廊〉（1940.2）、〈箕子林〉（1940.6），除了小說創作外，這些作家並撰有大量的雜文在日本文壇中持續發出朝鮮的聲音。

²⁶ 見保高德藏〈日本で活躍した二人の作家〉，《民主朝鮮》4 號，1946 年 7 月。

相，也就是不能忽略朝鮮近代文學是基於對日本近代文學的模仿複製過程。日本近代文學是日本社會的近代化過程產物，然而，朝鮮的文學自身缺少了這種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作為殖民地的朝鮮其實是對於殖民帝國文學的一種複製與模仿，可以說，朝鮮的近代文學精神實際上是一種架空的觀念，因此，這種透過對帝國的模仿而來的近代性有可能也僅是殖民地文學者的幻影與幻想。²⁷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殖民地文學者們對於這種近代精神的憧憬與模仿從而也確立了「國語」的近代性面相，基於對於近代的追求以及確信「日語」具有的國際化視野都給了殖民地的日語世代文學者與帝國之間「協力」的可能。

第二節 「內鮮一體」：皇民化政策與親日派

1931年的「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與1932年日本的左翼團體「ナップ」(納普)成員遭到檢舉逮捕的事件，宣告了日本的右翼化發展。從1933年日本共產黨幹部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的轉向聲明以降，1934年到1936年間日本的普羅作家寫作了大量的「轉向文學」，可以說日本文壇的左翼力量在政府的壓迫取締下逐漸削弱，隨著「國民文學」、「新體制」等口號的提出，日本文壇也在進行協力帝國的準備。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得總督府重新調整了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方針，武斷統治的殖民策略又重新啓動，台灣與朝鮮同時也開始實施「皇民化」政策。就戰前的朝鮮社會而言，在朝的日本人統治者是社會的上層，半島人則屬社會下層，殖民地的文化人菁英則居於殖民主與朝鮮大眾之間，具有調節斡旋的中介者角色與台灣的殖民地社會結構相近。為了維持日本國體概念的穩固，總督府在語言、文化與人種各方面都強調了大和民族與日語的至高性，以文明開化的象徵鞏固在治理上的絕對威權，此也成為日本在殖民地的普遍經營模式。總督府從殖民初期即呼籲的「內鮮一體」之同化政策，實際上不是一種對等的融合概念，而是上對下的「使文明化」的認知，因而有其落實上的難度。從殖民初期一直維持的不對等化的殖民社會，因日本進入戰爭期的緣故產生了變化，從「東北事變」開始，日本的侵略戰爭呈現一種持續的狀態，面對兵源、物資、財力皆大量耗損的現實情狀，殖民地的動員也成為帝國擴張必要的動力，因而在協力帝國的前提下，「日鮮一體」被重新提出，期待透過「皇民」的養成來支撐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建構計畫，究竟總督府如何透過「皇民化」政策進行殖民地意識型態的轉換？在對「皇民」的馴化過程中，民族的藩籬是否能夠打破，意即總督府的統治角色

²⁷ 見南富鎮《文学の殖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同註9，頁94-113。

與朝鮮民眾的被殖民角色能否得到改變，都是值得注意的面向。

另外，就文學界而言，30年代與40年代可說文學活動歷經極端轉折的年代，右翼勢力的崛起不僅影響了日本內地，甚至對於朝鮮、台灣的文學者都造成了思維震盪進而也影響文壇的發展，台灣在中日戰爭後面臨了「文學的空白期」直至40年代《文藝台灣》、《台灣文學》相繼創刊後才又帶動台灣文壇的創作風潮，因此，因「戰爭」所造成的文學思潮的「斷裂」提供筆者一個觀看歷史的空間，從而也得以審視朝鮮文壇的變化。從普羅文藝思潮被迫中斷以及文化人的「轉向」與「親日派」文人的產生都提供了檢視此斷裂所呈現出來的空間氛圍，特別是當帝國主義全面興起後，文化人如何在戰爭空間中轉化左翼思維與戰爭翼贊的衝突，同時在政治的操弄下，「親日」文學者與帝國之間的互動為何？值得注目。本節將透過教育、言語等政策檢討朝鮮的「皇民化」過程，並就「戰爭」與「轉向」議題探究殖民地文學者的認同意識，其中關於「內鮮一體」同化思想的推動，筆者想從兩個方向來審視，其一是從總督府的統治立場來探究同化政策體制的構成與推動，另一則是從殖民地文化菁英們提倡的「脫差別論」檢視朝鮮的立場。

一、「皇國」的課程：內鮮一體・皇民化政策的施行

1936年8月南次郎就任朝鮮新總督，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於戰爭期下的朝鮮成立國民總動員委員會（1938年），並設置「愛國班」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在其提倡的「國體明徵」、「教育刷新」兩大施政方針下提出了「日鮮一體」的同化政策：「確立半島同胞的國體觀念，堅定皇國臣民的信念，以內鮮一體扶翼皇運徹底宣揚皇道。」²⁸對於總督府而言，在戰爭的現實下，鑑於時局的急迫性將半島的朝鮮居民培養成「皇國臣民」是明徵國體的唯一之路，唯有養成「皇國臣民」才能夠擔當帝國重整東亞新秩序的助力，穩固帝國的霸權。總督府推動的「日鮮一體化」與「皇國臣民化」主要是為了動員朝鮮民眾協力戰爭，朝鮮作為「大陸兵站基地」必須承擔日本前往東北的人力與物資上的供給，為了確保日本在滿洲國的優位，日本政府透過朝鮮總督府鼓勵朝鮮農民前往滿洲開墾，進而又呼籲「滿鮮一體」以助其稱霸東亞的野心。日本政府企圖透過「日鮮一體」、「日台一體」以及「鮮滿一體」樹立「一體」的想像，為了打破民族間的隔離完成東亞共榮的帝國想像，其在殖民地以及滿洲推動的「國語政策」基本上承繼了上田萬年「日語乃是日本人之精神血液」的思想，藉由「國語」取代血緣，使國體論能夠

²⁸ 見朝鮮總督府《施政三十年史》，1940年出版，頁827。

超越種族奠定權威性支撐日本的侵略思想。²⁹

「皇民化」政策的推動可視為總督府同化政策的極致表現，日本方面雖援引《日本書紀》上的古神話藉此印證朝鮮在人種與文化上與日本是一體的論述，以支撐其所提出的「內鮮一體」之論調，然而，此種論證上的薄弱無法抹消朝鮮與日本的異民族事實，如何跨越「民族」的障礙消除殖民地的民族性也成為總督府在推動「內鮮一體」的同化工作中的首要任務。如何養成一位貞順忠良的皇國臣民呢？南次郎在「治物必先治心」³⁰的信念下進行皇民化政策的推動，包括了國語運動、宗教改革、改姓名以及志願兵的實施。1937年10月總督府頒布了「皇國臣民之誓詞」正式宣告皇民化政策的開始，皇國臣民之誓詞強調了三個重要概念：帝國、天皇效忠、國民，呼應了日本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強調的「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的戰時精神，³¹皇國臣民誓詞共有兩種，一種是加上假名注音的誓詞，提供給初等學校的兒童使用，另一種則提供給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及一般民眾使用，藉著朝會、儀式以及其他的聚會場合的反覆朗誦將此國民信條刻印在學童的心上，是一種皇民規訓化的基礎課程，此外1939年在朝鮮神宮外落成「皇國臣民誓詞之柱」，誓詞中並強調：國體明徵、內鮮一體、忍苦鍛鍊等三大綱領與目標提醒朝鮮民眾身為皇民的義務與責任，³²總督府透過各種具體的方式進行皇國臣民化的改造工作，一面高喊「內鮮一體」的政治口號，一面企圖以皇國臣民誓詞內化朝鮮民眾的認同意識。總督府在教育政策方面共經過三次的教育令的改正，1911年8月頒布第一次的教育令，以朝鮮人為對象，日本人的子弟適用於日本小學校令。依照普通學校規則的規定：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為四年，但依地方的實情也有短縮為三年的情形，滿八歲以上為學齡兒童，不設上限。普通學校的教學設有修身、國語（日本語）、朝鮮語及漢文、算數四門必修科目，其它像理科、音樂、體操、圖畫、手工、裁縫及手藝、初級農業、初級商業等雖也都有規定，但依學校的情形來決定，在這些必修科目中受到重視的為「國語」，擔任總督府學務長的大野謙一明白的表示：

在新教育中最重視的就是國語的普及，這是從最初便決定好的方針。不只是普通

²⁹ 筆者在第二章〈帝國想像與大東亞文藝運動〉中也提出日本帝國主義者將上田萬年的思想作為帝國共榮圈建構的一種基本信念的思考，以確定其君民同祖、萬世一系、忠君愛國思想的貫徹。關於上田萬年的思想參見《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7年12月出版。

³⁰ 見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東京：南次郎傳記刊行會，1957年12月出版，頁417。

³¹ 見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機關紙《國民精神總動員》，1937年12月1日。

³² 見朝鮮總督府編《施政三十年史》，1940年出版，頁789-792。

教育，就連實業教育、專門教育中也特別增加國語的授業時數並且徹底實行。³³

除此之外，關於教科書的記述用語方面，弓削幸太郎也提出：

除了朝鮮語漢文科外，全部都以國語也就是日本語來記述。³⁴

大野與弓削昭示了總督府在殖民地的管理上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國語」教育的確立，雖然殖民初期尚未有「內鮮一體」的皇民思想之提起，然而透過國語政策的推行，也可達到改變朝鮮原有的國家民族型態，使其順利成為日本的附屬之民，並且在近代體制的「國語」政策下樹立殖民地以日本為「國家」的概念也是在殖民初期總督府的最大期待。

1922年2月總督府頒布第二次教育令，實施的對象包括在朝的內地人。在第二次的教育令中最大的轉變是納入在朝的內地人子弟，此舉具有將內地人與朝鮮人同等對待的意義，可以說是形式上「內鮮一體」的實現。然而，卻又不盡如此，仔細審視教育令的第2條與第3條，其中明白規定了內地人學童作為「國語常用者」，依照「小學校規程」進入小學校，至於朝鮮人的學童作為「不常使用國語者」，依照「普通學校規程」進入普通學校，仍是採取內地與朝鮮學童分學的方式。此種分學的方是不僅是在第二次教育令中如此，在第三次教育令與國民學校令中也照樣承襲，從第三次教育令以降，在條文中皆有明文規定要實施內鮮共學，最終皆因現實因素而未能實現，此也顯示了總督府在推行「內鮮一體」上的現實難度。總督府的相關人士渡邊豐日子指出內鮮共學的執行難度：

（如果內鮮共學的話）為了朝鮮人的子弟，必須全神貫注於國語，如此一來，對內地人的教育就會產生很大的障礙。如果像對內地人的兒童一樣以同樣程度的國語對待朝鮮兒童，如此一來朝鮮兒童就無法充分的學習到國語。³⁵

孩童對「國語」理解程度的差異也導致了總督府完成實際的「一體」共學制上的困難，就教育而言，朝鮮社會的學童教育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以此外推，整個朝鮮社也也呈現一種不對等的型態。雖然在第二次教育令的25條中明文表示，在特的情況下，國語常用者可以進入普通學校、高等普通學校或女子高等普通學

³³ 見大野謙一《朝鮮教育問題管見》，收於《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28卷，1936年9月，頁72。

³⁴ 見弓削幸太郎《朝鮮の教育》，收於《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28卷，1923年5月，頁283。

³⁵ 見朝鮮總督府學務局渡邊豐日子《朝鮮教育の側面觀》，收於《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28卷，1923年5月，頁9。

校就讀，此外，國語不常用者也能進入小學校、中學校以及高等女子學校就學。但是現實上此種情況相當罕見，另外總督府又明文規定，依照第二次教育令所訂定的內鮮兒童的入學規定，內鮮共學的朝鮮學生人數不能超出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總督府的教育令之實施，名義上想塑造內鮮一體的整體像，實際的運作上卻又處處限制朝鮮學生，透過總督府的殖民地教育的操作模式，可以理解其推行國語運動效果不彰的原因。³⁶另外，雖然位居高階的內地人與殖民地的菁英使用了「國語」，然而現實朝鮮社會中存在的朝鮮語境的優勢也不能忽略，朝鮮語的使用也使得與民族性相關的朝鮮文化、習性與傳統保存下來，朝鮮語境的存在抵抗了總督府的「國語」推動，從而要透過「國語」灌輸給朝鮮民眾的國體論述便出現了極大的障礙，此也成為總督府在戰爭期間推行皇民化政策行的最大因素。第三次教育令於1938年3月頒布，以明文表示要採取「內鮮共學」，第三次教育令中提出以內地教育令適用於朝鮮教育的提案，意即，依照教育令的規定，無論是內地或是朝鮮都將採取完全相同的教育工作。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第三次教育令的頒布時機，正值中日戰爭開打不久，日本內地已經進入戰時體制的配置，在南總督接任之後首要的任務便是對殖民地重新再整編，也就是動員朝鮮民眾對日本的戰爭翼贊。第三次的朝鮮教育令中為了消解小學校與普通學校這種對立的情況，總督府特別在第三次的教育令發佈之際大聲疾呼：

透過這次朝鮮新教育令改正，廢除普通教育中的國語常用者與不常用者的區別，要開啟內鮮人共同享有在同樣的法規下接受教育的大道。³⁷

從總督府大費周章的教育改革中，可以窺見在戰爭的焦慮下想透過教育養成「真正」皇國臣民並為日本所用的急迫性，然而如前所述，內鮮共學具有實質上的困難，殖民地的「小學校規定」無法適用於內地的「小學校令」，也就是說，在內地推行的義務教育無法實行於朝鮮。此外，雖然中學校已經統一名稱，但是一般情況下，內地學生入學的中學校是原本便接收內地學生的中學校，與朝鮮學生入學的由原本高等普通學校改稱的中學校不同，實質上還是一種別學的狀態。儘管如此，在語言方面，總督府也持續的進行越來越的嚴格的國語政策，在「小學校規定」中新增加要求教師必須使用「國語」的項目，教科書方面，除了朝鮮語外，一律使用國語，實際上幾乎完全使用國語進行授課。大東亞戰爭爆發後的1941

³⁶ 參見鈴木讓二《日本の朝鮮統治--「一視同仁」の建前と実像》，東京：學術出版會，2006年4月初版，頁191-194。

³⁷ 見朝鮮總督南次郎〈諭告〉，《施政三十年史》，頁780。

年 2 月總督府頒布「國民學校令」，將「小學校規定」更改為「國民學校規定」，「小學校」則全部更改為「國民學校」為四年制，教學科目設有四科：國民科、理數科、體練科、藝能科及職業科，其中國民科包含了修身、國語、國史及地理等內容。另外，總督府為了達到「一面（村）一校」的目標，從 1934 年開始又設立了簡易學校制度，附屬於地方的公立普通學校之下，修業年限為兩年，這是為了讓無法進入普通學校就讀的學生們也能習得「國語」以及其它技藝的輔助教學，讓這些社會的底層民眾也能進入國家體制中便於管理。從「小學校」到「國民學校」的易名可以看出總督府在「國民」養成工作上的用心，為了因應大東亞戰爭中更多的人才需求，以及提高殖民地對帝國、天皇的忠誠度，皇民的練成也成為總督府在大東亞建設中重要工作。

為了提高國語的利用以及鞏固由「國語」建構出的帝國霸權，總督府對於朝鮮語的使用採取了逐漸壓縮的策略，最後在戰爭的催化下更迫使朝鮮語退出教育空間，使得國語具有優勢的地位。在第一次教育令的「普通學校規則」中，朝鮮語及作為書寫工具的漢文皆列入的必修課程，此外學校在前二學年每週的國語與朝鮮語的授課時數是 10：6，也就是說，每週有 10 堂國語課程及 6 堂的朝鮮與漢語課程，到了三、四學年則改為 10：5，最後的五、六學年採 9：4 的授課比例，至於修身課程上則維持一週一堂不因學年而變更。到了第二次的教育令，前一學年的國、朝比例 10：4，第二學年為 12：4，第三學年到第四學年為 12：3，五、六學年為 9：3，國語（日語）的授課比起第一次的教育令增加不少，到了第三次的教育令中國語在第一學年為每周 10 堂，第二學年到第四學年維持每週 12 堂，到了第五、六學年維持每週 9 堂，在比例上似乎維持著第二次教育令的國語授課標準，但是此時期的朝鮮語課程有了重大的改變，朝鮮語課程被挪出必修課程成為選修課程，並且在授課時數上明顯的縮減，第一學年為每週 4 堂，二、三學年為每週 3 堂，到了四、五、六學年則僅剩每週 2 堂，此外，在修身教育上增加為每週 2 堂。到了 1941 年小學校改正為國民學校之後，朝鮮語的教學完全中止。³⁸除了朝鮮語教學的廢止外，1940 年《朝鮮日報》與《東亞日報》的朝鮮語報紙也遭到廢刊，可以說，1940 年以後日語作為帝國的象徵與傳遞工具獨佔了殖民地的公共領域，透過日語一元化的發言機制，對朝鮮人認同意識的養成與推動大東亞帝國的建構產生極大的功效，特別是在所謂的日語世代間，透過語言滲透

³⁸ 參見鈴木讓二的「教科別每週授業時間數の推移」製表，收於氏著《日本の朝鮮統治--「一視同仁」の建前と実像》，頁 190。

皇國與皇民的意識型態成爲總督府培養翼贊人力的最佳途徑。

除了教育上的國語普及運動外，總督府也意識到必須從日常生活面進行皇民化的養成工作，特別是將朝鮮風俗習慣日本化的工作。依照 1938 年總督府出版的《時局對策調查會諮問答申書》中，提出了以一般民眾爲對象的皇國臣民之國體明徵思想的養成工作要綱，並以此爲最高指導原則。首先就強化「日鮮一體」的執行上提出多方向的落實計畫，包括了：闡明朝鮮統治精神、實踐國體觀念之明徵、闡明日鮮歷史關係、徹底執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實踐教育的普及與改進、統一青少年的訓育與指導工作、擴充強化勤勞報國隊、謀求日常生活的內鮮一體化、爲了使內地人增加，訂定獎勵定著的方法、獎勵內鮮人通婚並制定相應對策、將日本精神與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合爲一體的努力以及徹底普及志願兵制度的實施等落實工作，此外，爲了達成在日常生活中謀求內鮮一體化的要求，總督府又提出了多樣要求，包括：徹底落實祝祭日的根本意義、徹底實行皇國臣民之誓詞的普及以及獎勵皇國臣民體操、使用皇紀及皇國年號、對於有礙於內鮮一體的文書、言動、書籍、映畫、音樂一律徹底取締、從食衣住行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上採取內鮮混合，勵行國語生活、謀求武道的普及，從身心的磨練領會日本精神。³⁹必須注意的是，在總督府提出的以「內鮮一體」爲終極目標的皇民化政策中，基本上所採行的是單向化的執行策略，最大的目標在消除朝鮮的民族面向並確定注入日本精神的養成方式，對統治階層的朝鮮總督方面而言，此單向化的殖民改造並不構成內部的矛盾，這種理所當然的態度來自於日本自文明開化以來的民族優越感，特別是在發動大東亞戰爭後，確信自身爲東亞最先進、文明的態度更加被催化，在現人神的（天皇）的引導之下，日本的統治階層確信大東亞共榮的實踐是日本對東亞的最大建樹。⁴⁰總督府確立了皇民化的基本方向策略後，透過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來推行落實，先是成立了推動的組織：朝鮮聯盟，聯盟下面設有道、府郡島、邑面（村）、町洞里等地方聯盟，此外又系聯了官公署、學校、

³⁹ 見朝鮮總督府《時局對策調查會諮問答申書》，1938年9月，頁1-6。

⁴⁰ 鶴見俊輔引用第一任緬甸首相巴穆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看法說道：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而言，他們受到了人種的束縛，並且這種觀念也最爲偏頗。因而就結果而言，他們完全缺乏理解外國人或者讓外國人理解自己的能力。（中略）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只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待一切，更糟的是，要求其他國家與他們共事時必須採用他們的思考方式，對他們而言，要做事只有一條路，就是採用日本人的方式，他們也只關心一個目的，就是日本的利益，對於東亞帝國而言只有一種使命，就是與日本永遠結爲一體，成爲另外的滿洲國與朝鮮。（中略）因此以結果而言，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們當地居民之間永遠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理解。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戰爭時期的日本統治群在思考東亞的邏輯。見鶴見俊輔《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4月出版，頁84-85。

會社、銀行、金融組合、工場、商店等各種聯盟，在最下設有愛國班。國民總動員聯盟是一種與行政機構一體的統治輔佐機關，屬於全國性的組織，以職域奉公為重點進行皇國臣民化的實踐，對於上述《時局對策調查會諮問答申書》中提出的皇國臣民化要綱進行具體的實踐工作，如執行皇居遙拜、皇國臣民之誓詞的朗誦、國與運動、神社的參拜、勤勞儲蓄等具體化的皇民化事宜。至於在日的朝鮮人方面，1934年由內務省、拓務省以及朝鮮總督府共同協議對在日朝鮮人的同化方針之制定，也就是對居住於內地的朝鮮人，以內地同化作為指導教化的基調，期許其作為皇國臣民竭力奉公。1938年11月由政府相關部門推舉任過朝鮮總督府學務長的關屋貞三郎為理事，成立「中央協和會」。以在日朝鮮人的同化為目的的協和事業共有分為行政機關與民間團體兩部分，行政機關是以厚生省、內務省為中心，分有中央與地方機關組織，民間團體則有中央協和會、道府縣協和會及朝鮮獎學會等，主要是推動內地融和的機構。1939年10月，為了強化在日朝鮮人的同化工作，政府透過協和事業運作幾項要目，分別為：皇民精神的涵養、矯風教化（風俗）、福祉增進、保護救濟、協和事業的調查研究、協和事業趣旨的宣傳與普及等，期待透過這些具體工作的實踐組織在日朝鮮人為日本協力，1944年，協和會改稱「中央興生會」積極參與戰爭協力。

總督府對於皇民化的日常生活面之落實上還推動了「創氏改名」的改姓名活動以及強迫參拜神社等政策。總督府於1937年4月設置「司法改正調查委員會」主要是對親族繼承關係的朝鮮慣習進行改定，議定將朝鮮的姓氏改為日本名，並於1939年11月的制令19號中對於「朝鮮民事令」作了改定，明文規定廢止朝鮮固有的姓名制度，以戶為單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總督府於1940年2月施行改姓名運動，要求朝鮮民眾至同年8月10日為止必須提出決定好的日本姓名，企圖從司法上完成內鮮一體的實踐。雖然統治者熱切的宣傳「創氏改名」是一視同仁大理想的具體實現，並且是肇國大精神八紘一宇的實踐，同時是大和大愛的充分展現，並且認為朝鮮人的姓名中有「姓」而無「氏」，「姓」是宗族的名稱，「氏」則是家的稱謂，朝鮮只有「姓」而無「氏」代表其「現代家族制度」尚未確立，因此創氏改名是為了去除朝鮮社會的「非近代性」，⁴¹也就是要讓朝鮮文明化的具體作法，實際上與其說朝鮮人的姓是「非近代性」的表現，不如說是日本人期待透過對朝鮮人改姓名活動，將朝鮮人的家族觀念統合於日本的「家」觀念。此外，更強調創氏改名運動並非強制要求而是為了因應朝鮮民眾的熱烈的

⁴¹ 見御手洗辰雄《南總督の朝鮮統治》，頁23。

期待而發起，然而從其具體的相關措施來探究可以明白真象，總督府爲了有效的運行創氏改名運動以朝鮮知名人士爲號召，此外，不改姓名的家庭無法在社會中得到較好的待遇也是朝鮮人改姓名的重要因素，例如，不改姓名者的子弟無法進入學各級學校、日本教師對於不改姓名者的子弟可以毆打、斥責、總督府相關機構不予採用，即使是現職者也採取罷免措施、不改名者在各行政機關的事物一律不予回應、不改姓名者被認定是非國民或不順從的朝鮮人而被記入警察筆記中，隨時進行查察、跟蹤，或者成爲優先的勞務徵用對象，並且在食糧或其他物資的分配上被排除在外、鐵道局或運送公司不接收不改姓名者的貨物，此外，學校的教師或洞長、里長們負有改姓名的責任，依其成績評價其指導與行政能力，影響其升遷。⁴²由上述看來，雖然總督府強調非強制性的面向，然而從種種對應狀況來看，不改姓名者根本無法立足於朝鮮，相較於台灣的改姓名運動，朝鮮方面具有強烈的強制性質，此也從皇民化時期的兩地文學者的發表署名上得到印證。至於強行參拜神社的宗教改正運動，1925年祭祀天照大神的朝鮮神社改稱爲朝鮮神宮，將神道作爲統治朝鮮的重要手段，1933年以後配合「農村振興運動」所展開的「心田開發運動」爲了強化皇國臣民化的精神，急速增加神社數量，同時爲了以神道來謀求國民精神的振興以樹立舉國一制的體制，1936年8月正式公布改正神社規則，制定「國幣社」職制，確保其作爲精神改造的重要位置，並由道府邑面供給神社所需之神饌幣帛等供料，更推動「一面一神社」運動強邀民眾參拜，企圖從宗教面進行皇民精神之改造，藉由神道思想奠定日本萬世一系、八紘一宇的國體論。並訂定每月一日爲愛國日，由愛國班動員民眾前往神社參拜，揭揚國旗齊唱皇民誓詞，對於非神道教信徒的基督教徒也強行要求其參拜神社，拒絕者就會遭到入獄或者將關閉教會的處罰，並且在各朝鮮家庭要求設置神棚奉祀天照大神，每天清晨予以膜拜。除了這些在生活上勵行的皇民化策略外，1938年2月22日朝鮮總督府頒布敕令95號「陸軍志願兵令」正式啓動朝鮮的志願兵制度，凡年滿17歲的朝鮮青年皆可志願從軍。總督府的皇民化政策的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出皇國臣民以供國家之用，志願兵也成爲其皇民化策略中最具體的一環，在「聖戰」與「榮光」政治宣傳下，特別是對戰爭期的日本而言，朝鮮志願兵制度的成立代表皇民化策略的奏效，同時能及時的補充日本的兵力資源之不足，也最實際的幫助了帝國的東亞建構。⁴³

⁴² 見朴慶植《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支配》下卷，東京：青木書店，1973年6月初版，頁62-63。

⁴³ 關於「陸軍志願兵」的募集要綱以及相關法規之全文，參見《文教の朝鮮》，1938年4月號。

二、「轉向」與親日派的興起

戰爭期間，無論是對日本或者朝鮮的知識人而言，在談論戰爭翼贊之前，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一個重大的思想史轉折，即「轉向」議題，此命題也牽涉到對知識人與大眾、組織與個人、抵抗與服從等相關的討論。日本共產黨於 1933 年發表的「轉向宣言」是日本國家機器強行介入的結果，也顯示了日本朝向軍國主義擴張的國家路線。中日戰爭爆發後，不僅是日本內地文壇進入備戰體制，殖民地的文壇也在「皇民化」運動下納入總督府的協力政策。如前所述，朝鮮文壇到了 30 年代初期展現了興盛的一面，寫實主義的普羅文學與唯美主義的浪漫文學在文壇上各領風騷，也呈現出朝鮮文壇活潑的面貌，朝鮮語的雜誌方面有：《新東亞》、《新家庭》、《三千里》、《新朝鮮》、《新人文學》、《朝鮮文壇》、《朝光》、《四海公論》、《學燈》、《批判》、《野談》等十餘種藝文雜誌的刊行，報紙方面也有《東亞日報》、《朝鮮日報》。另外，在日文雜誌方面，有日本出版的《改造》、《文學案內》等文學、綜合雜誌以及《清涼》、《朝鮮》、《朝光》、《綠旗》等在朝鮮創刊之文藝誌提供了 30 年代初期朝鮮文壇的發表園地。⁴⁴然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左翼言論與活動受到警察單位的取締與打壓，最為明顯的是 1935 年「朝鮮プロレタリア藝術同盟」(カッパ)在總督府的「交涉」下宣布解散，此也預告了左翼運動在殖民地的式微，此外，受到時局的影響，總督府實施了「時局特別警戒」條款，以警察駐在所為單位展開「時局座談會」，取締具有左翼色彩傳單的散佈與左翼言論的宣傳，嚴格控制殖民地的言動，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治與文學的複雜糾葛也透過總督府與文學者的互動而展開。

受到「轉向」聲明的影響，在日的朝鮮共產主義者金三峯於 1933 年 7 月也發表了轉向聲明：

(我)自覺到要靠著共產主義來解放朝鮮民族終究是無法達成的事，藉由將來以日本為盟主的亞細亞民族之大同團結，應該可以為朝鮮民族帶來幸福。⁴⁵

⁴⁴ 《新家庭》、《新東亞》是由東亞日報發行，是具有民族立場雜誌，《三千里》為綜合誌，《朝光》是朝鮮日報發行的趣味雜誌，類似日本的趣味誌《キング》，《新朝鮮》被譽為朝鮮的《改造》、《中央公論》為一綜合誌，《新人文學》結合了趣味與文藝，受到了文學青年的歡迎，讀者層也最為可觀，至於《朝鮮文壇》則是刊載各種類文人的中立文學誌。這些朝鮮語的雜誌在 30 年代初期營造朝鮮文壇創作的繁盛期。見朴勝極〈朝鮮と文学——一九三五年文壇の回顧〉，《文學評論》3：1，1936 年 1 月，頁 160。另外，1930 年代初期在朝鮮發刊的日報，朝、日、英三種語言的報紙共有 31 種，朝文 7，英文 1，日文。見朴慶植《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支配》下卷，頁 200。

⁴⁵ 見《高等警察報 3 號》，警務局保安課，1933 年 11 月，頁 7。

除了金三峯外，在朝的共產黨金若水、李熙東也在同年9月發表〈同志諸君に告ぐ〉(告同志諸君)等轉向聲明書，值得注意的是轉向聲明中所參雜的民族視野，在其轉向聲明中出現了「民族幸福」的關鍵詞。從左翼運動的挫折中，轉向者意是到了現實的「時局」問題，進而將日本正在擴張的帝國主義思想納入了思維，認為當日本完成建構東亞新帝國後必須面臨帝國重編工作，而作為帝國一部分的朝鮮也將有可能脫離二等居民的殖民身分，在身分上得到對等的提升。當然，這也許僅是身為被殖民者的一種幻想，但卻成為「轉向」的一個重要內在支撐，因此解釋朝鮮知識份子的「轉向」過程，不能僅就外部的壓迫來考察，雖然外部的壓力是迫使「轉向」的直接力量，然而轉向者內在的自我調整面向也不容忽視。究竟作為朝鮮社會中堅階層的文化人在「轉向」的過程中產生了何種思維轉折？身為「中介」帝國與殖民地的傳遞者，在帝國的霸權建構過程中起了何種效果？值得關注。宮田節子在討論關於「內鮮一體」提到了中日戰爭對朝鮮民眾的影響，她引用了曾參與三·一運動的朝鮮民族主義者徐椿在〈朝鮮に於ける愛國運動〉說法，徐椿認為從1910年被併邦開始至1930年的21年間，在朝鮮人的精神中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對於日本抱著負面感情同時與日本人之間也無法相容。⁴⁶直到1931年的滿州事變發生，朝鮮民眾對此也抱持著日本勝利或失敗與我無關的心態，同時還想著也許透過國際聯盟的干涉能夠制止日本的侵略，結果日本遠比他們設想來得強大，國際聯盟也無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為。從滿州事變中他們也意識到了朝鮮獨立運動的不可能。⁴⁷由於意識到獨立的不可能，加上南次郎在皇民化政策中提出了「新朝鮮人」的口號，都刺激了轉向的思考。朝鮮文人的轉向議題，一方面無可否認是由於國家權力介入運作而導致，另一方面，也必須討論文化人的認同鬆動，在整個殖民社會皆被總督府以皇民化運動籠罩之際，特別是在帝國主義發展的特殊空間中，朝鮮作家們的「轉向」以及「親日」的思想轉折有其必然性，在戰爭期間統治者對於反對聲浪的壓迫以及堅持皇民化的推動使得殖民社會的發言空間縮小此為其一。另外，無法獨立於日本之外的意識型態也影響了殖民地知識菁英的判準，特別是處在特殊的戰爭空間中，「內鮮一體」提供了其幻想的空間，成為落實「脫差別化」的一個出路，此為其二。受到內、外因素影響的朝鮮文學者們的「親日」傾斜也逐漸與翼贊政策合流，終而

⁴⁶1919年3.1運動中日本對朝鮮的鎮壓造成慘重的死傷，另外，1923年關東大震災中日本為了防堵朝鮮的大量移民也虐殺約六千六百多名的朝鮮人，此外，農民運動中受到日本鎮壓的民眾也不在少數。參見棍村秀樹《朝鮮史》，東京：講談社，1977年10月初版。

⁴⁷參見宮田節子〈「內鮮一體」の構造〉，收於《朝鮮民眾と「皇民化政策」》，東京：未來社，1985年7月，頁156-164。

統合成為協力系統，在「大東亞」中成為帝國擴充的重要奧援。⁴⁸

1937年8月31日由京城保護觀察所主辦了「轉向者座談會」，與會的除了日本統治的相關人士外，出席的轉向者有：金漢卿、李銅材、金東育、李福基、吳元吉、朴得龍、韓鳳植、尹基鼎、李起銖、尹龍辰、權五相、朴英熙、崔浩然、廉龍燮、羅俊英等人，（李箕永與宋武鉉（宋影）採書面發言方式）其中以朴英熙、李箕永、宋武鉉為藝文界的代表人士。宋武鉉提出：「從事文學部門工作的我，必須要落實文章報國，真實的藝術是要反應正當的時代生活。」朴英熙也提出「現下的時局，必須樹立永久性的思想基礎，並且是東洋式精神。」⁴⁹透過座談會的發言中可以明白的窺見總督府在戰爭期中全面動員殖民地的決意，以及文學者在時局下被要求負起的輔佐皇民化政策之文藝責任。在日本左翼文學者如林房雄、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等人表態「轉向」之後，朝鮮方面也出現了「轉向」文人。1938年7月24日由全鮮轉向者組成的「時局對應全鮮思想報國聯盟」在京城（首爾）成立，以權忠一為轉向者代表，文學者的代表人物為朴英熙、金基鎮。在宣言中強調兩個重要目標，第一、要確立發揚日本精神之東洋文化的新體系，全面反抗歐美的破壞性文化。第二、透過政治、經濟等領域將日本、滿洲、支那等結為一體樹立新體制，對抗侵略亞洲的諸國。⁵⁰並且要透過「內鮮一體」的國民運動昂揚皇道精神，徹底擊碎反國家思想者，除了京城的總部外，更在大田、公州、開城、春川、仁川、清州等地設立支部，配合總督府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全面展開皇民化的協力運動，「思想報國聯盟」的成立代表了朝鮮言論思想統一的具體化，同時也宣告朝鮮「親日」團體的誕生。中日戰爭後，日本進入「銃後奉公」的社會態勢，1938年6月發表「勤勞報國隊施行要領」等愛國運動，受到這股風氣影響的內地文壇也組織了從軍的「筆部隊」前往戰線，產生了如火野葦平《麦と兵隊》這類戰爭文學並受到相當大的迴響。受到戰爭文學的影響，

⁴⁸ 關於文學者個人的轉向，著名的如李光洙。李光洙在1937年因為民族主義團體「修養同友會」的緣故被起訴，入獄，後因病被保釋。保釋期間在京城設置的日本精神訓練所「大和塾」中寫了〈日本精神の修行〉，他表示：我痛感身為舊韓國人的朝鮮人，要成為日本人必須要更加好好的修行。此外在「大和塾」中他又發表了：日本是一個民族的國家，日本民族中絕對沒有所謂的差別，在天皇之下，日本人一切皆平等。但要如何成為日本人呢，主觀的來說，我們要成為日本人就要為天皇而生，為天皇而死。當這種感情成就之時，我們便成為日本人，當二千三百萬朝鮮人具有一致的情緒，所謂的內鮮一體也就能完成。李光洙即是夾在總督府的外在壓迫以及作為朝鮮人的「脫差別化」思考的文學者，其發言也成為最典型的文學者轉向聲明。參見渡邊一民《「他者」として朝鮮文學的考察》，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6月初版，頁93-94。

⁴⁹ 〈轉向者座談會〉，《法政新聞》371、372號，1937年10月5日、10月20日。

⁵⁰ 見〈宣言・決議 時局對應全鮮轉向者聯盟の結成式舉行〉，《京城日報》（夕刊），1938年7月25日。

1939年朝鮮文壇也決定派遣從軍筆部隊，學藝社的林和、人文社的崔載瑞以及文章社的李泰俊擔任聯絡事宜，並得到博文書館、漢城圖書、三文社等出版社的協助組成「皇軍慰問作家團」，推舉出的實行委員有：李光洙、金東渙、朴英熙、李泰俊、林和、崔載瑞、李寬求、盧聖錫、韓奎相等九人，最後決定由金東仁、朴英熙、林學洙三人擔任慰問大使於4月15日出發前往戰場。出發前夕，1939年4月9日金龍濟於《每日新報》上發表〈皇軍慰問文士部隊〉，其中明言文學者應該以內鮮一體的精神為主並積極實踐，以及「銃後文學」(後方文學)的可能性。朴英熙於同年6月4日於《國民新報》上發表〈北支旅行記〉，9月、10月又於《東洋之光》上發表〈戰線紀行(一)、(二)〉，在〈戰線紀行〉的「序」中朴英熙提出了內地文壇關於戰爭文學所引起的回響，同時對於此次作為皇軍慰問作家的代表深感榮幸與感動，紀行文中強調：

我們大家是希望能使大眾深刻的認識時局，同時也能在朝鮮文學上創造出新的內容和形式。(中略)皇軍的忠勇精神最後也能夠昇華為日本精神，這種精神所到之處一定是充滿了正義與和平。⁵¹

此外，林學洙也發表了〈ペン部隊報告〉(筆部隊報告)⁵²與《戰線詩集》⁵³，皆在文章中表述了實現「內鮮一體」的決心，以及對於皇民精神的養成意識。就文學者而言，「思想報國聯盟」與「皇軍慰問團」的成立意味了以朴英熙、金基鎮、林和等朝鮮普羅作家的代表的「轉向」，更是朝鮮文學者向統治者傾斜的實際行動，此外如李光洙、金龍濟等多人也多在雜誌《東亞之光》中發表了對日協力的文章，可以說，知識層的集體轉向與親日派的出現使得總督府成功的保有殖民地權力結構的穩定，從而確立日本在朝鮮的戰爭體制。從殖民初期便擔任社會指導階層的文化人，其所抱持的反侵略支配的信念以及民族主體性的立場，長期以來成為朝鮮民眾的重要信仰來源，因此，文化人們捨棄堅持的民族與反支配的立場向殖民主靠攏成為協力機制一環的言動，可視為是對於殖民社會的「反」日力量的鬆動，就總督府而言，這種鬆動正是總督府積極推動文化人協力工作的目的所在，然而，文學者的「轉向」邏輯並非如此單純，其中隱含了複雜的「民族」認同糾葛。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中直接表明要脫離亞洲的兩個惡友：支那跟朝鮮，對於文

⁵¹ 見朴英熙〈戰線紀行(一)〉，《東洋之光》，1939年9月。

⁵² 見《國民新報》，1939年5月21日。

⁵³ 1939年7月由博文館刊行。

明開化的日本而言，朝鮮是一個等待文明開化的前近代國家。日韓合邦後，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人也成為二等人，長期面對殖民下的不對等關係的也讓知識階層的朝鮮文化人意識到民族階級的議題，三·一運動的失敗宣告了武裝獨力的不可行，但在之後實行的文化政治中又給了朝鮮民族者一個發展的空間，他們企圖透過普羅運動來尋求朝鮮的平等位階，然而卻又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宣告失敗。在緊縮的戰時空間中，透過總督府緊迫推行的「內鮮一體」的皇民化運動，提供長期對立的內鮮關係想像的空間，也就是「脫差別化」的視線。李光洙在〈內鮮一體と朝鮮文学〉中對於朝鮮現狀的提及道出當時文化人的共同心態：

今天朝鮮的「內鮮一體」運動，一部份或許能稱它是官製的，或者貶低它只是虛偽的裝模作樣，這些都是以疑問的眼光來看待它，忽視因果規則的看法。因為朝鮮民眾的進路，除皇民化之外別無他途，已儼然成為事實；另一方面，站在國家立場而言，已表示對待朝鮮民眾，會給予一切都平等的臣民資格，這兩樣如相合一致，必能達到「內鮮一體」。只是當前在內地人來看，朝鮮人還沒有完全忠誠，在朝鮮人來看，內地人也沒有完全展現其誠意。因為還缺乏很多能夠證實其理想的實例，也許會令人感覺它只是嘴巴講講而已。雖然已經得到一部份的人呼應，但是要使養育在數千年不同歷史之地，號稱七千萬對二千萬之兩大民族成為渾然一體的國民，這是歷史大業，要求其成果能一朝一夕得之，根本是太性急的想法。如果能互相真心對待，抱著同樣的信念，決心一起向著目標努力，這就是一大收穫，應該一起慶祝。而且光是今天朝鮮民眾對皇民化的心理準備，我斷言一定能夠渡過今天之非常時局。⁵⁴

可以說日本進入「戰爭期」迫使對殖民地的統治結構進行調整，特別是在壓抑殖民地的民族性的部分，南總督的「內鮮一體」政策雖然與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脫差別」思維迥異，但兩方面具有重合處，期待透過內鮮一體政策達到殖民翼贊目的的統治者與期待透過內鮮一體達到真正社會位階一同的殖民地文化人對於「內鮮一體」明顯的都有所期待。對朝鮮的民族派文學者而言，隨著日本魁儡政權「滿洲國」的建國，以及中日戰爭中連戰皆捷的氣勢，他們意識到「獨立」的絕望進而開始思考「內鮮一體」的可行性，如同李光洙在文中提出的見解，從「內鮮一體」中可以窺見「平等」的希望，意即，在日鮮一體的同化過程中，朝鮮人可望脫離社會次等人的地位，尋求與日本人相同的社會位置。這種「脫差別

⁵⁴ 見春園生（李光洙）〈內鮮一體と朝鮮文学〉，《朝鮮》298號，1940年3月，頁66。

化」的思考邏輯在《綠旗》中心人物玄永燮的發言中又可得到印證，玄永燮在1938年7月7日的《每日申報》上發表了〈朝鮮語使用の全廢〉，主張將朝鮮語全部廢除，並認為如果讓朝鮮學童一直學習兩種語言的話，朝鮮學童就不可能學好國語，如此一來也不可能和日本人對等。李光洙在之後的發言也是順著此邏輯，認為要作到日鮮一體必須要成為日本人，不僅是像玄永燮提及的廢除朝鮮語，更是要有為天皇生，為天皇死的皇民精神，也就是徹底的精神改造。玄永燮並期許：「當朝鮮人可以成為日本人以上的日本人之時，便能開展朝鮮明亮的未來。」在他的發言中可以發現強烈的對「脫差別化」的渴望，同時也呼應了總督府推動的「志願兵」政策，志願兵的出征過程中有寫血書的傳統，從這種血書儀式中可以窺見為了跨越血緣的隔閡，為日本而戰的志願兵期待透過替皇國流血完成換血的願望，成為一位比日本人更日本的皇民。相較於總督府想藉由「日鮮一體」完成政治協力的統治心態，殖民地的文學者們與其說是附庸於統治者成為「親日派」，不如說是在「身分差別」的殖民地的現實中尋求一條朝鮮的出路，只是其「脫差別化」的思考中也可能面臨在「皇國臣民」的馴化過程中被「脫朝鮮化」的危險，特別是對於「國語」世代而言，透過教育，以及殖民霸權文化生產的馴化，「皇國青年」其在國族想像的認同上勢必有所置換，戰爭期的朝鮮文壇在轉向文學者與「國語」世代的活動下，抱持著帝國重編的幻想進入了戰爭協力機制，成為日本文化翼贊的一員。

第三節 「決戰・朝鮮」：文學者總崛起

隨著「大東亞戰爭」正式開戰，致力於建立「新亞洲秩序」的日本，也正式啟動大東亞共榮圈之建構方針。對殖民地文化建設方面，不僅持續其皇民化的精神改造運動，基於國體精神下，更號召殖民地人民投入翼贊大東亞的行列，特別是在文藝方面，作為文化翼贊一員的朝鮮文學者，除了「內鮮一體」思想的表述外，更重要的是「大東亞視野」的融入，在總督府的官方運作下文藝作品出現了許多與戰爭及政策相關議題的創作。如：尹斗憲在〈戰勝の歲暮〉一詩中呼喊：

亞細亞的清晨終於來臨

睜開眼吧十億東亞的主……

進軍的號角已經可以聽見

聖戰現在正在呼喚我們啊⁵⁵

由詩作中可以看出朝鮮文學者們與大東亞戰爭時局的系聯，並且扮演了號召協力以及歌頌「聖戰」的角色。1942年11月日本政府廢止「興亞院」成立「大東亞省」，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目標，動員了內地、殖民地並結合其勢力範圍的各政權，包括了滿洲國、華北、華中等地，期待能夠建立以日本為首「超克歐美近代」的新亞洲組織。從大東亞戰爭開戰至戰勢緊張的決戰期，日本透過各種文化翼贊組織、文學會議、演講活動的系聯企圖透過文學者們的協力型構出大東亞文學圈，擔任帝國的大東亞戰爭文化生產的重要工作。同為殖民地的台灣在戰爭期間，文學家們在「皇民文學」的書寫中，期待以「南方文學」奠定其在大東亞文壇的位置，以此來提升長期被邊陲化的台灣文學之位置，受到戰爭的催化下，文學不僅是文化建設的一環，同時也成為殖民地作家欲藉此提升在帝國位置的一個重要工具。與台灣同處邊陲的朝鮮，1940年以後在大東亞「八紘一宇」的號召下，朝鮮的「戰爭文學」、「愛國文學」、「國民文學」、「決戰文學」等「親日文學」以各種樣貌來展現對戰爭的奧援。⁵⁶本節將就大東亞戰爭中朝鮮文壇的翼贊動態以及與大東亞文學者之間的互動探討朝鮮文學者的戰爭思維，大東亞共榮圈的提起，是否刺激了文學者們重新思考皇民化過程中的「去鮮化」，意即，在「地方文化」建設的政策下，大東亞文學圈中的朝鮮文學究竟以何種面貌來展現？筆者在第三章中討論了台灣文學者在皇民文學中表述的複雜糾葛，本節將探討日本另一殖民地--朝鮮，以及文學者於戰爭期間的大東亞文化共榮的對應。此外，關於朝鮮文學者與作品的探討，不能忽略在日朝鮮文學者的文學翼贊視野，朝鮮文人遊走於日本內地與朝鮮的緊密關係也提供討論朝鮮文學者的共榮想像與帝國之間的互動糾葛一個重要的參照。相較於台灣文學者與在台的日本文化人們的動員面向，身為大東亞一環的朝鮮透過在日與在朝的文化人展現出何種「東亞像」值得關注。

一、總力戰體制與文學者動員

朝鮮總督府在戰爭期間企圖以實行「日鮮一體」的皇民化運動改變朝鮮人

⁵⁵ 見平沼文甫（尹斗憲）〈戰勝の歳暮〉，《國民詩歌》，1942年3月，頁83。礙於詩文過長，本文僅收錄部分。

⁵⁶ 雖然台灣與朝鮮文壇都歷經皇民化運動的洗禮，然而兩地在文學表現上有了微妙的差異，台灣方面隨著皇民化運動的興起，因此田中保男提出了「皇民文學」的說法，朝鮮方面在皇民化運動期間，並沒有相關的「皇民文學」的提起，但隨著日本文壇興起的戰爭文學、愛國文學、國民文學、決戰文學等翼贊熱潮，朝鮮文壇的「親日文學」中可以看出對於內地翼贊文學的模仿。

長期以來「不逞」(不順從)的一面,期待可以將朝鮮人改造為忠良「國民」成為皇國的翼贊力量。日本將戰線從中日戰爭擴大至大東亞戰爭的過程中,也進而著手進行推動作為總力戰一環的「文化翼贊」之相關機制。筆者在第二章中已經討論了日本對於共榮圈的文化建設等相關文藝協力體制的確立,包括大政翼贊會的成立(1940),文學新體制的推進(1940)、文學報國會(1942)等戰時體制的建構。1941年12月日本文藝家協會與大政翼贊會文化本部舉行了「文學者愛國大會」集結了文學者約500餘人,並在宣言中提出了翼贊的重點:完遂大東亞戰爭、反歐美勢力、創造東洋精神的日本文學、結合東亞文學者等訴求,確立日本內地文壇協力的基本方針,⁵⁷朝鮮總督府對殖民地的文化翼贊體制也在內地文壇的基本方針下被確定。有鑑於此,在官方的一體化政策下,1940年前後的朝鮮文壇也呈現出積極翼贊的氣氛,可以說,南次郎的總督任內,對於朝鮮的經營主要落實了兩個方案,一是「內鮮一體」的皇民化政策,一是戰時體制的確立。張赫宙(野口稔、野口赫宙)、李光洙(香山光郎)、朱耀翰(松村紘一)、金龍濟(金村龍濟)、朴英熙(芳村香道)等朝鮮文學者在日本發行的《新文化》、《セルパン》、《知性》、《朝鮮畫報》、《モダン日本》、《新太陽》、《文學界》、《文學報國》、《文藝》、《文藝首都》、《文藝春秋》等雜誌中都有作品發表,在戰爭期的內地文壇積極的爭取朝鮮在帝國中的發言位置,此外,朝鮮發刊的日文雜誌《東洋之光》、《綠旗》、《興亞文化》、《國民總力》、《觀光朝鮮》、《文化朝鮮》、《新時代》、《春秋》、《國民詩歌》、《朝光》、《內鮮一體》中也都能見到這些朝鮮文學者活躍其中。

朝鮮文學者們於1939年10月16日召開了「朝鮮儒林大會」,公開表示對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協力,同年10月29日在總督府官方的支持下以金東煥、鄭寅燮、朱耀翰、李箕永、朴英熙、金文輯為幹事,成立「朝鮮文人協會」。大會開會式上李光洙發言道:

這次本協會的創立,是新國民文學的建設與內鮮一體的具體展現。人類有史以來便不能從國民生活中脫離而生活,文學也是脫離國民生活便無法存在。半島文壇的新建設必須從內鮮一體出發不可。⁵⁸

在大東戰爭尚未爆發之前,總督府當局的基本視野還是著重於推動「內鮮一體」

⁵⁷ 見〈文學者愛國大會宣言〉,《日本學藝新聞》,1942年1月1日。

⁵⁸ 參見林鍾國著,大村益夫譯《親日文學論》,東京:高麗書林,1976年12月初版,頁87。

的皇民養成運動之落實，透過「朝鮮文人協會」的組織可以具體的掌控文化人的活動，進一步推動新體制運動，也就是通過舉辦「文藝之夜」、「座談會」等活動灌輸朝鮮「皇民」對國家的盡忠思想，並且藉由「朝鮮文人協會」的組織跟內地文壇達成互動的聯繫網絡。⁵⁹協會在宣告成立後，此集結文化人的組織開始積極的進行文藝協力的工作，先於同年 12 月 21 日在京城府民會大講堂召開「文藝之夜」，分為演講與詩歌朗誦、小說・紀行・評論、歌唱與舞蹈四部。隔年 2 月 11 日又在平壤召開文藝演講會，重申朝鮮人的文藝使命、強調非常時期中的國民文學之重要性、說明小說與時局的緊密關係等相關協力議題，執行文學報國之任務。此外，為了加強國民的後方意識，文人協會在朝鮮軍報道課、總力聯盟宣傳部、警務局、學務局等相關機構的要求下進行全鮮巡迴演講會，1940 年 11 月 23 日分成四班前往朝鮮各處進行演講，擔任講演講師的文學者們有：金東煥、俞鎮午、寺田瑛、山本長夫、朴英熙、鄭寅燮、李軒求、白鐵、崔載瑞、李石薰、李孝石等日、朝文人。從文人協會的文藝演講的展開，可以看出戰爭期間朝鮮文壇在總督府的指導下受到政治宰制的面向，在皇國臣民誓詞宣示、遙拜天皇等「皇民養成」儀式中，文學者們也成為「八紘一宇」、「日鮮一體」的皇民養成推手，為總督府進行思想改造計劃的最佳輔佐員。此外，為配合中央大政翼贊會的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聯盟於 1940 年 10 月 16 日改組為「國民總力朝鮮聯盟」徹底執行皇國臣民化運動，1941 年 7 月朝鮮文人協會在中日戰爭最如火如荼之際宣告：

在半島正施行教育令的改正、志願兵制度、創氏制度。這些都是朝鮮一體最可貴的表現。伴隨著這個劃時代的歷史的感動事實，半島人已經完全開啟了皇國臣民的道路。半島人成為陛下的赤子，要以作為皇軍的榮譽竭盡忠誠，因此，現在半島人已經堂堂成為日本人，成為勇猛的日本人、燃燒正義的日本人，脫掉舊朝鮮人的皮，成為以大和魂生存的日本人。⁶⁰

由此決議文中可以窺見一個訊息，筆者以為與其說這個決議文是向著朝鮮民眾的發言，不如將此視為向朝鮮統治者的宣告，透過前述的講演運動的召開，加上教

⁵⁹ 朝鮮文人協會制定的工作大綱主要有六項：

1、文人會館的建設。2、設定文藝賞。3、制定協會內文藝賞審查委員會。4、討論宣告協會結成召開文藝之夜，經由貞洞中央放送局向全朝鮮放送的事宜。5、為了巡訪重要都市展開盛大國民文學運動之故，討論文藝之夜即座談會的舉辦事宜。6、為了明春在東京舉辦的文藝之夜，如何與內地文壇緊密互動，讓中央文壇認識朝鮮與朝鮮文壇之事宜。見林鍾國著，大村益夫譯《親日文學論》同前註，頁 88。

⁶⁰ 同前註，頁 92。

育令改正、志願兵、創氏改名等改造運動，文學者們透過此召告，正可以緩和總督府下壓的促進皇民思想的改造壓力，並且，成爲日本人的朝鮮皇民也可向日本要求帝國中的對等位階回應。除了朝鮮文人協會的成立外，「皇道學會」也於 1940 年 12 月成立，以實踐內鮮一體，窮盡皇道爲宗旨，並在總督府的精神養成所：「大和塾」舉辦皇道講習會，以皇道精神的灌輸達成日鮮一體的終極目標。又，1941 年 8 月三千里社在戰時體制下也成立了「臨時對策協議會」，以皇國臣民化運動的實踐爲宗旨，同年「興亞報國團準備委員會」、「朝鮮臨戰報國團」也成立，成立宗旨皆爲以皇國臣民昂揚皇道精神等日本精神的養成實踐。

1941 年 12 月大東亞戰爭爆發，文學者們以各樣的形式來表達協力決意，以朝鮮語書寫的協力決意有崔貞熙、毛允淑、盧天命等人〈對英美開戰と婦人の決意〉以及金八峰的戰爭詩〈亜細亜の血〉(上)、(下)⁶¹，尹斗憲所寫的日文戰爭翼贊詩文則遲至 12 月 23 日才刊出。另外，朝鮮文人協會也於 12 月 8 日公開宣告反英美、建構東亞的文學報國決議，並決定召開決戰下文化演講大會：

宣言

我們所預期的事態終於到來。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對美英宣戰的大詔讓我們無所畏懼而精神渙發。我們看到日本與美英之所以完全斷絕邦交，那是因為遵守道理正義的日本與狡猾固守舊思想的美英之間，落差已經非常大，遂有今天的開戰。現在正是日本以其實力將東亞新秩序建設之癌的美英勢力排除於東亞，並建立東亞民族永久和平的時候。吾等無比神勇之皇軍在陸海兩地，燃起必勝不敗之信念，順利的獲得戰果。在此之際，吾等執筆的文人，必須抱著不亞於前線勇敢戰士的熱情和覺悟，專心一意爲天皇，集中全部的才能全力配合戰爭目的的執行。已經過了左顧右盼的空談時期了，我們前進的路只有一條，我們一部份還抱著安逸態度的國民應當要覺醒，必須信守仁義，向著滅己殉國發揚純粹日本精神之途前進，想到光輝的日本前途時，吾等之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內鮮完全成爲一體，將不變的信念付之實踐，真正的戰鬥現在才要開始，我們每一個人都擔負著國家的存亡，在文學領域裡發揮我們的本領，真正對國家有幫助的時候來臨了，我們發誓我們會堅定信守天命，蹶然奮起開始文筆進軍。

⁶¹ 崔貞熙等人的決議文見《每日新報》(日刊)，1941 年 12 月 12 日。金八峰的戰爭詩刊載於《每日新報》，1941 年 12 月 13、14 日。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朝鮮文人協會)⁶²

至此，在大東亞戰爭的催化下，文學總動員體制也正式啟動，文學者們不僅擔任朝鮮皇民化運動的推手，更進一步也承擔了建設東亞的任務，爲了更徹底執行國民文學建設與統合文學者，1942年3月25日朝鮮文人協會創刊《朝鮮文人協會會報》並重新改組，訂立四個實踐要綱：(一)、促進文壇的國語化，包括：國語文學賞的設定雜誌國語欄的擴充、國語創作的指導(召集作家會議)。(二)、文學者的日本鍛鍊，包括：聖地參拜、勤勞奉仕的實踐、舉辦日本古典研究會。(三)、作品的國策協力，包括：日本精神的作品化、道義朝鮮確立的翼翼探究、東亞新制序建設的徹底認識、徹底徵兵制的趣旨。(四)、現地的作家動員，包括：縣內增產運動的現地調查、北南支的戰地探訪、滿州開拓村視察。相較之下，同爲殖民地的台灣在進入大東亞時期後，在文學報國的層面出現跟朝鮮不同的文學展開，台灣的皇民化政策雖然也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沸沸揚揚的開展，然而在改名運動與相關政策的實行上比起朝鮮來的寬鬆，⁶³並且在動員作家現地調查上，台灣的皇民奉公會遲至1944年才動員台灣作家前往現地參觀書寫「報導文學」，鼓舞勤勞報國的思想，比起朝鮮的現地作家動員晚了約兩年。因爲有了較大的發言空間，台灣的文學者如張文環、呂赫若等人以及《台灣文學》同人，以書寫鄉土對應皇民文學的創作展現了不同向度的文學表現，藉皇民文學之名呈現台灣風土的文學表現也使得台灣在大東亞時期的文藝創作上得以多元化的展現，既有像西川滿式的浪漫派視野，也有濱田隼雄的外地寫實文學視野，同時也存在陳火泉、周金波、王昶雄這種認同搖晃的「皇民文學」。

反觀朝鮮文壇，在「國家總動員法」的施行下，朝鮮統治當局承襲日本文壇對言論與出版的嚴格統制，報紙方面以節約用紙的名義進行「一縣一紙制」⁶⁴，此外，雜誌、單行本的發行也同樣具有嚴格的規定。在此種情形下，先是面臨1937年《朝鮮中央日報》的廢刊，1940年《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也相繼廢刊，1941年《文章》、《人文評論》也被強制廢刊，總計在大東亞戰爭時期被廢刊的雜誌多達21種，僅有親日色彩的雜誌得以創刊或承續，⁶⁵加上總督府的強

⁶² 見《京城日報》(夕刊)，1941年12月11日。

⁶³ 相關比較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收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前揭，頁33-75。

⁶⁴ 日本在1942年7月24日由情報局統合報紙，實行「一縣一紙」制。

⁶⁵ 戰爭期間的親日性質雜誌有：《綠旗》1936年創刊，綠旗聯盟，《人文評論》1939年創刊，發行人爲崔載瑞(石田耕造)，人文社，《文章》1939年創刊，發行人爲李泰俊，文章社，《新時代》

勢主導皇民化的社會氛圍，可以說，朝鮮文人在時局的壓迫下傾向國策實有其現實的背景。除了朝鮮文人協會的活躍外，1940年成立的「國民總力朝鮮聯盟」(簡稱總聯)可以視為朝鮮版的大政翼贊會，其前身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聯盟」，是輔助總督府進行後方活動的重要團體，其綱領為：「基於國體本義，實現內鮮一體，在各自職域全力以赴滅私奉公，期待完成國防國家體制，並向東亞新制序邁進。」基本上承襲了大政翼贊會的設立綱領。有別於文人協會以文學者為動員中心的性質，總聯的最主要工作是以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延續與農村振興運動兩方面為重點，最終目標在於透過實踐發揮國民總力。由於翼贊性質的加強，並將本來的機關誌《總動員》改題為《國民總力》。此外，為了配合新體制的建構，重新整頓文化活動，將思想部一分為二，另設文化部，第一回文化部的文化委員由：安寅植、金億、金斗憲、洪蘭坡、崔南周、白山青樹、沈亨求、大東碩奎、鄭春洙、鄭仁果、白鐵、東原寅燮、廣田鍾郁、方漢駿、朴慶浩、牧山瑞求、俞鎮午、芳村香道、李象範、李創用、李能和以及另外47名日本人所組成，從事文化翼贊相關政策的執行，「總聯」可視為總督府主導下的龐大翼贊組織。文化部成立後除了演講活動的舉辦之外，並於1941年舉辦國文(日文)的文化翼贊小說徵稿活動，由寺田瑛、辛島驍、俞鎮午擔任評審。1942年也舉辦了國語的國民歌謠創作懸賞徵稿與「大東亞戰爭」的國語論文懸賞徵稿，企圖透過懸賞活動刺激作家從事文化翼贊的工作。此外，「總聯」也模仿大政翼贊會出版的翼贊叢書的作法，從1941年4月下旬以後開始出版「總力叢書」，每月出版兩回，期待在出版方面也能夠達到翼贊戰爭的效果，進而完成對朝鮮居民的精神改造工作。1942年繼任的小磯國昭總督在南總督建立的半島皇民化與戰時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以「透徹國體本義，實踐皇運扶翼」為其行政方針，以大東亞的視野提倡共存共榮的八紘一宇精神，在朝鮮推動所謂的「道義朝鮮」⁶⁶與貫徹國體本義之政策。小磯總督任內為了推動朝鮮的內地化以及完成決戰體制的確立，在行政制度上進行改革，另外，為了因應戰爭人力不足的困境，更實行徵兵、學徒兵、海軍特別志願兵、現員徵用等一連串的動員令。⁶⁷可以說，朝鮮的殖民統治已由

1941年創刊，發行人為盧益亨(瑞原益亨)，《國民詩歌》1941年創刊，發行人為道久良，國民詩歌聯盟，《國民文學》1941年創刊，發行人為石田耕造(崔載瑞)，人文社，《大東亞》(三千里改題)1942年創刊，發行人為白山青樹(金東煥)，大東亞社。參見朴春日《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朝鮮像》，東京：未來社，1969年11月初版，頁356。

⁶⁶ 所謂的「道義朝鮮」政策為透過共存共榮的大道義，對英美進行道義式制裁、道義式攻勢，並以國體為基礎昂揚道義。

⁶⁷ 總督府為了因應兵員的不足，動員朝鮮於1943年8月1日實施徵兵制以及海軍特別志願兵，同年，9月1日施行改正國民徵用令，10月20日實施學徒兵制。

南次郎時期的「親日氛圍」轉向了「決戰氛圍」，小磯任內首要考慮的是如何將半島民眾戰力化的議題，意即，透過各樣動員教育、練成活動將朝鮮轉為可供戰爭所用的資源，特別是對「人」的鍊成的養成工作。⁶⁸

朝鮮文壇在決戰氛圍下也有了新的變革，日本自從大東亞省正式設省後，面臨日益擴大且不利的戰局之際，傾注全力宣傳大東亞共榮的理念，試圖以大東亞共榮的烏托邦想作最後的賭注，將歐美上綱為「東亞之敵」，並型塑出日本的正義形象企圖號召東亞各國的協力。1943年1月11日「總聯」爲了國民文化建設而統合各文化部門組成藝術家團體聯絡協議會，以便更強力有效的宣傳日本的大東亞建構以及東洋文化的精神，包括了朝鮮文人協會、國民詩歌聯盟、朝鮮俳句作家協會、朝鮮川柳協會、朝鮮音樂協會、朝鮮美術協會、朝鮮演劇協會、朝鮮映畫製作社、報導寫真協會、宣傳美術協會等多個文化團體皆被納入此協議會中。到了1943年4月17日，朝鮮文人協會、朝鮮俳句作家協會、朝鮮川柳協會、國民詩歌聯盟等文學團體解散，並仿照日本文學報國會組成「朝鮮文人報國會」，約莫一千名的文學者皆被納入此文學報國組織下，此機構可視為朝鮮版的文學報國會。成立的宗旨爲：

我們堅定的表明決意，在大東亞戰爭已經進入決戰階段，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今後將會展開更熾烈的思想戰，全鮮的文學者必須一起挺身更加展現團結，擊退英美的功利文學，在朝鮮樹立世界一流的皇道文學，我們發誓作為戰鬥的文學者，我們將會表明我們堅固的決心以報答聖恩。

（昭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朝鮮文人報國會）⁶⁹

文學報國會的宗旨展現了與朝鮮文人協會著重以「內鮮一體」實踐翼贊協力的不同視野。朝鮮文人協會的工作較偏重於對後方思想輔導建設性質，而文學報國會則突顯文學者也是戰士一員的總力戰視野，將文學宣傳、皇道思想的樹立直接視爲戰略的一環，也就是將自身投入思想戰的戰場中，成爲筆戰士的一員。就文學

⁶⁸ 小磯總督的皇民鍊成共分為兩種，一種爲一般鍊成，即修養鍊成，適用於一般民眾。另一種爲特別鍊成，是爲了兵力動員所需的特殊鍊成。修養鍊成分爲四種類，分別爲：指導者鍊成、職域鍊成、學校等的鍊成、地方指導鍊成。其中第一種指導者鍊成的過程較爲繁瑣，鍊成時間較長，必須進入皇道修鍊院進行講習，主要學習國體、皇道等日本精神、武道、體操，及學習日本的世界觀等訓練。第二種職域鍊成，以中央、地方官公署、警防團、各會社、組合等職員爲對象，每月的星其一爲鍊成日，學習國民禮儀、體操、教鍊等。學校鍊成方面，以中等學校以上爲例，學生依特定的鍊成日進行鍊成工作，內容與職域鍊成相似。地方指導鍊成則在各地鍊成道場依照指導者指示來鍊成。參見林鍾國《親日文學論》，前揭，頁21-27。

⁶⁹ 參見《京城日報》，1943年4月17日。

翼贊而言，考察「總聯」的組成分子與朝鮮文人報國會的組成人員可以發現重疊的現象，可以說，「總聯」與朝鮮文學報國會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機構，「總聯」所負責的是綜合的翼贊體制之組成與調動，文學報國會則是以文學者為主，偏重文化翼贊的團體。總督府透過「總聯」與文學報國會的運作，基本上已經大致完成朝鮮決戰體制的佈署組織，並透過這兩個主要的戰爭翼贊組織運作相關的戰爭思想動員

除了上述總力戰翼贊組織的結成外，筆者擬從兩個面向討論文藝體制的落實。一是座談會的舉行。1940年8月日本內地文學者菊池寬、小林秀雄、中野實與李光洙、金東煥、俞鎮午、鄭寅燮、朴英熙等朝鮮文人協會會員們就文人協會的成立、內鮮「血」的聯繫、文人與書寫機關、國語普及、內鮮協力、文學賞的設立、中央文壇的交流等議題進行了座談，此座談會的議題與朝鮮文壇的總力戰工作具有密切的關聯，藉著與內地文學者們的座談，朝鮮的文學者們也在政策的落實上達到一些初步的共識與落實方向。⁷⁰另外，1942年4月刊登於《綠旗》上的〈新しい半島 文壇の構想座談会〉，與會成員有：金村龍濟、金鍾漢、田中英光、鄭人澤、寺本喜一、津田剛、牧洋（李石薰），就文學者具有指導國民文學實踐的責任提出具體建議，並針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提出解釋，認為文學具有承載國家理想主義的任務。在此座談會中，文學者們道出了一個廣被台灣文學者們利用的觀點，亦即地方文化的討論。與會的文學者們提出了韓雪野的〈血〉、李孝石的〈薊の章〉、鄭人澤的〈殼〉進行討論小說中關於地方文化的展現，牧洋認為韓雪野在〈血〉中書寫的民族的宿命是一種舊式的表現，而李孝石在小說中呈現的內鮮戀愛問題、結婚問題則點出了相當重要的議題，但受到金村龍濟與田中英光的否定，金村與田中認為李孝石的作品通俗成分太過濃厚，此外寺本認為鄭人澤的作品中表現了生活痛苦的一面，但應該要更表現其痛苦的部分才是，結果鄭人澤在作品中並未達到此種表現。因此三部作品皆被否決而認定僅屬通俗之作。在座談會上，金鍾漢明確的提出地方文學的思考認為：應該將地方文化視作為國民文化的一環，要在地方建設成爲中央一樣就必須抱持著地方人式的國民意識再出發。換句話說，文學中必須表現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不單是異國情調的展現，而是在特殊性中又有文學的普遍性，也就是具有特殊地方性的文學展現文學的普遍價值（國體精神）。金鍾漢接著提出了新地方主義的看法，否定以都會

⁷⁰ 參見〈文人の立場から菊池寛等を中心に一半島の文芸を語る座談会〉，《京城日報》（夕刊），1940年8月13-18、20日。

人的鄉愁移情的地方主義，認為那只不過是中央對地方的籠統的假設，他認為朝鮮文壇必須以地方作為思考發展國民文藝，如此才能與中央文壇齊頭並進。⁷¹金鍾漢的發言點出了對於朝鮮國民文學的具體發展方向，也就是以地方文化的展現進入中央文壇的思考。筆者認為從戰後被歸為是親日作家的金鍾漢的思維中實際上隱藏著朝鮮民族性的思考，特別是對地方文化的見解透露出以地方抵抗中央的思維，或者可以視為一種想以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尋求東亞位置的思考，由此可以窺見被收編於翼贊文化團體中的朝鮮文學者的多元想法與視野。又，1943年8月舉行的由俞鎮午（朝鮮文人報國會）、津田剛（總力聯盟宣傳部長）、金村龍濟（金龍濟）（朝鮮文人報國會）三人討論的〈「半島文化」を語る座談会〉強調了對於大東亞文化建設的支持，重申日滿支一體的東亞精神，此外，並提出國語文學的提倡，這是礙於朝鮮語文學作品的多量影響了大東亞一體化的展現，因而在國語國家一體化的政策下，國語文學的提倡成為朝鮮文壇不可避免的話題，⁷²尤其是朝鮮文壇所呈現的雙語現狀，對於想以國語作為大東亞連結工具的日本政府而言，形成了障礙，雖然1937年後總督府官方更加強推動國語運動，但是一般民眾的國語能解度的低落，使得以朝鮮語為主的報章、雜誌仍擁有一定的閱讀市場。即使總督府在國民學校中取消朝鮮語的課程，並且1941年以後朝鮮語的報刊雜誌面臨萎縮或改為日本語的狀態，但一般民眾仍然日常用語仍以朝鮮語的使用為主，也因此，總督府一邊推行國語運動之際，一邊仍然靠著翻譯工作將日本的文學、翼贊思想透過朝鮮語的中介傳達給一般民眾，甚至於文學者的日文作品也多有朝鮮語的翻譯，可以說，代表國家霸權的國語雖然在戰爭期的朝鮮社會取得絕對優勢，但代表朝鮮民族性的朝鮮語並未因此而消失，總督府欲藉由皇國臣民化運動所建造的「一體」朝鮮的期待，實際上透過朝鮮民眾對語言的選擇已經宣告了「內鮮一體」的不可實踐性。⁷³除上述的座談會外，總督府旗下的各單位也經常性的召開對時局、經濟、文化相關議題的座談、對談會，筆者認為從日本當局於戰爭時期頻繁在本土與殖民地召開的座談會中，呈現出了統治者與殖民地菁英的一種具體的「連結」關係，座談空間的展現會可視為統治當局與社會菁英

⁷¹ 見〈新しい半島文壇の構想座談会〉，《綠旗》7：4，1942年4月，頁66-82。

⁷² 見〈「半島文化」を語る座談会〉，《朝日新聞》，1943年8月20-22日。

⁷³ 1938年玄永燮雖然為了呼應了南次郎總督的國語運動提出「朝鮮語使用全廢論」，但南次郎有鑑於全廢的不可行性而提出：排斥朝鮮語是不可能的事，只能盡力的普及國語，這次的國語運動被認為是朝鮮語的廢止運動，這是不正確的。由此可知，作為統治者的總督府意識到廢止朝鮮語的不可行性，因而僅能從大力推行國語運動來取代朝鮮語的優位。參見《每日申報》，1938年7月9日。

向一般大眾展示政策的途徑，特別是這種座談會的召開是以刊載於報紙、雜誌的形式來呈現，統治階層一面訂定政策推行戰爭協力，一面又透過「中介」的知識階層向一般大眾宣揚政策，藉著與媒體的結合統治當局有效的推動國家的協力工作。

在座談會的舉行之外，文學賞的頒布也是有效推行翼贊工作的辦法，透過文學賞的運作能夠迅速建立文學的典範，透過這些典範代表向大眾推動文化翼贊，同時對推動國語政策與皇民精神的樹立有立竿見影的功效。朝鮮文壇的文學賞，除了朝鮮文人協會頒布的文學、論文有獎徵賞外，較具代表性的有：國語文藝總督賞、朝鮮藝術賞等大賞。國語文藝總督賞是鑑於大東亞總力戰的發動，期待透過文化部門以八紘一宇的皇道精神為主，努力一掃英美的思想殘留。總督獎的創力要旨是希望發展健全的半島文藝，並促進半島文台的國語化，選拔基準為：以日本精神為中心的國語作品，對於民眾具有良好的啓發效果者，並表現豐富藝術內容。1943年3月1日第一回國語文藝總督賞頒給了金村龍濟的《亞細亞詩集》，同年4月5日總聯也跟進頒布國語文藝聯盟賞，由牧洋（李石薰）的《静かな嵐》（寧靜的暴風雨），其得獎的理由為通過半島知識人的皇民化過程，確立半島文學界的國語化，對於推進戰時下的半島文化有相當大的功勞。第二回總督賞在1944年3月15日頒布，由石田耕造（崔載瑞）的《轉換期の朝鮮文學》獲獎，總督府認同石田耕造透過雜誌《國民文學》提倡的文學必須貫徹日本精神之努力與功績。第三回於1945年3月22日發表，由鄭人澤的戰記小說《武山大尉》與作品集《清涼里界限》獲獎，得獎理由是對於國語文學特別是戰爭文學有極大的貢獻。另一個重要的文學賞：朝鮮藝術賞，共頒發六回，第一回朝鮮藝術賞於1940年3月頒發，由李光洙的〈無明〉獲獎，第二回文學方面由李泰俊獲獎（1941年4月），第三回不明，第四回文學方面由李無影〈青瓦の家〉獲獎（1943年3月20日），第五回文學方面由松村紘一（朱耀翰）詩集《手に手を》（手心手上），值得一提的是朝鮮藝術賞的評審委員包括了芥川賞的委員，意即，朝鮮藝術賞的典範性不僅是來自於朝鮮文人的認同，來自於內地文化人如菊池寛、久米正雄、佐藤春夫等人的肯定更是樹立其經典的地位。

可以說，透過座談會、文藝賞的舉行有效的串連了戰時體制下的文化動員，使龐雜的組織結構透過這些運作有效率的推動協力，對於朝鮮的翼贊體制有了極大的助益。

二、帝國中的朝鮮像：朝鮮的「親日文學」

大東亞戰爭期間，三回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對於東亞文學者的串聯有明顯的作用，特別是在凝結對戰爭的共識以及翼贊方向都有了明確的討論工作。在日本文學報國會的策動下，1942-44年舉辦的三次大東亞大會可以視為東亞文學者的總聯結，筆者在第二章、第三章中對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已有詳盡的介紹與討論，本文期待通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討論朝鮮文人的東亞對應與視野。第一回文學者大會舉出了「大東亞文藝復興」的大旗藉以統合初次具結的大東亞文人，並提出「大東亞精神樹立」、「大東亞精神強化普及」、「通過文學的思想文化融合方法」、「透過文學完遂大東亞戰爭的方法」幾個基本東亞視野進行討論，與會的朝鮮文學者為：香山光郎（李光洙）、芳村香道（朴英熙）、俞鎮午、辛島驍、寺島瑛五名，大會提出設立大東亞文藝協會、文學家、學術交流、大東亞文學賞等具體事宜的訂立，可以看出第一回的文學者大會基本上是東亞文學者初步統合的階段。李光洙對「關於「大東亞精神樹立」主題提出朝鮮文人的看法，他認為大東亞精神是一種真理，因此大東亞精神不是要去樹立，而是去發現。大東亞的真髓為何呢？也就是一種捨己的精神。這個語言在儒教中就是仁，就佛教而言則是慈悲，而日本的清明心就是將仁與慈涵括於其中。進而對英美的思想進行反駁，認為英美的思想是一種利己的思想，只想利用東亞民族的分裂從中獲得漁翁之利，這種利己主義不單是不能存在於東亞社會中，也是不能適用在世界。李光洙的發言中並言及了對於東亞未來的想像，也就是期待透過日本的東亞建設，完成一個烏托邦的大東亞世界，而朝鮮在這個新的大東亞世界中也可期待重生，獲得身分上的對等。第二回文學者大會為「決戰會議」呼應了決戰時期的緊張感，朝鮮代表為：俞鎮午、柳致真、崔載瑞、牧洋、金村龍濟、津田剛等六名。主要討論決戰文學的確立執行要項，並頒發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賞，一等獎從缺，二等賞由日本的庄司總一《陳夫人》、大木惇夫《海原にありて歌える》（對海高歌），滿洲國的石軍《沃土》、爵青《黃金的窄門》，以及中華民國的予且《「予且短篇小說集」日本印象》、袁犀《貝殼》獲獎，會中俞鎮午提出了「朝鮮文化運動報告」，指出鮮文壇有兩次的重大轉換，一是大東亞戰爭的爆發，使得朝鮮文學者樹立了日本式的世界觀，一是徵兵制的實行，使得以朝鮮語構成的朝鮮文學一轉樹立了以日本語構成的朝鮮文學，也就是朝鮮文學不再以 2500 萬的半島人為對象，而

是以一億同胞作為對象。⁷⁴從俞鎮午的發言中可以大致看出整個朝鮮文壇的動態，面對統治當局對朝鮮語的壓抑，以及報刊雜誌的「國語化」，朝鮮文壇的日本語創作也成為主流。在皇民化運動以及國語文學的大會結束後返朝的文學者在朝鮮文人報國會的主導下舉行報告演講會，發表與會的感想與見解。第三回的「南京大會」朝鮮代表為香山光郎，金村八峰（金基鎮），大會上討論了四個重點，分別為：以文學與戰爭為中心，討論文學的宣傳性以及方法論、就東亞固有的文化與精神進行意見交換、關於大東亞宣言第二條中關於文化各事項的積極實踐問題以及大東亞諸民族的文化水準與民族意識昂揚的問題。此外，並公佈大東亞文學獎的受賞者，一等賞從缺，二等賞頒發給鏹田研一（日）《滿洲建國史》、梅娘（中）《蟹》、古丁（滿）《新生》、道·麥·索德（泰）《這就是人生》、荷·埃·克魯沙（菲）《塔隆·瑪麗亞》，並決定要設置推動大東亞興隆的機構：興亞院，這是一個為了要達成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的文化人統合之機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使得邊緣化的朝鮮文壇重又獲得注目，內地文學者們在文學者大會後與朝鮮文壇有了較為緊密的互動，如菊池寬等人的訪朝等活動，以及內地文壇的朝鮮熱潮。可以說，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使得東亞的文學者們得以建構大東亞文學圈，同時也可窺見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的造像下，戰爭中的大東亞文學者們投射於「共榮圈」之想像。

在總力戰的呼聲下，作為文化戰士一員的朝鮮文學者們在文學表現上究竟呈現出何種樣貌？活躍於戰爭期的朝鮮文學者有：李光洙、張赫宙、金東仁、金東煥、金文輯、金史良、金素雲、金岸曙、金龍濟、金鍾漢、金八峰、盧天命、毛允淑、朴英姬、白鐵、俞鎮午、李無影、李石薰、李孝石、鄭飛石、鄭寅燮、鄭人澤、趙容方、朱耀翰、蔡萬植、崔南善、崔載瑞、崔貞姬等人，幾乎統括了活躍於戰爭期的朝鮮作家。⁷⁵其中，張赫宙是朝鮮文學者中較特殊的例子，他雖然是朝鮮出身的文學者，但 1936 年移住內地，成為日本文壇中最熟悉的朝鮮文學者，特別是進入戰爭期後，張赫宙成為內地文壇與朝鮮文壇一個相當重要的系聯角色，1942 年日本文報國會成立後，張赫宙隸屬於其中的「皇道朝鮮研究會」，負責對朝鮮的作家派遣、視察內地居住的朝鮮人，研究朝鮮文化與介紹朝鮮文學、舉辦講座使文學報國會一般會員也能了解朝鮮、在朝鮮社誌文學報國會支部

⁷⁴ 見〈大きいなる融合—決戦文学の理念確立〉，《文學報國》，1943 年 9 月 10 日。

⁷⁵ 李光洙在戰後對其協力身分辯護道：「活在朝鮮的朝鮮人每個人都是對日協力者。」見李光洙〈我的告白〉，收於《李光洙全集》7 卷，頁 286。原文為韓文，本文引自並木真人〈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前揭，頁 101。

等工作，可以說是連結內地文壇與朝鮮文壇的重要橋樑，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張赫宙也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中朝鮮的重要御用作家。如前所述，朝鮮的親日文學中包括了戰爭文學、愛國文學、國民文學、決戰文學等相關的文學作品，隨著日本的戰爭策略的轉換，朝鮮文壇在文學翼贊策略上也跟著進行調整，如：內地文壇於大東亞戰爭之後興起「國民文學」的寫作風氣，受此影響，1941年11月京城的人文社創刊了《國民文學》，朝鮮文人協會也於1943年出版了「朝鮮國民文學集」。藉由對文藝翼贊體制的爬梳可以得知朝鮮的文學者們在戰爭期間，特別是進入大東亞戰爭後，幾乎全被收編進文藝協力體制中，被收編的文學者們透過文學者大會、座談會、雜文、決議文進行對日協力的表述，並附和總督的內鮮一體、皇道思想之養成運動，呈現出一元化的翼贊表述態勢。究竟朝鮮文學者的一元化翼贊書寫中隱藏著何種對帝國的想像？筆者在討論「親日派」時提及朝鮮文人所具有的「脫差別化」視野，這種視野又如何落實於作品中？值得關注。本文擬對「親日文學」之文本進行探析，重新檢視朝鮮親日派作家的「親日」書寫。

由於朝鮮文人的日文作品發表場域不僅止於朝鮮文壇更廣及內地文壇，因此在進入文本之前，掌握朝鮮文學者在日本內地文壇與朝鮮文壇的發表概況，有助於釐清「親日」文學的樣貌。朝鮮文學者早在30年代初期即以表述朝鮮現狀的寫實主義作品為主，展開前進內地文壇的嘗試，張赫宙的得獎作品〈餓鬼道〉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受到朝鮮文學者陸續進入內地文壇的刺激，日本的文藝誌也陸續有關於朝鮮文學的介紹，但真正在內地興起「朝鮮文學」熱潮則是到了戰爭期間，有鑑於朝鮮作為日本向大陸前進的兵站基地的重要性，日本也開始重視朝鮮的戰略位置，並且積極的製造「日鮮一體」、「日鮮同祖」的神話。在戰爭的催化下，內鮮有了緊密的互動，也因此產生了「朝鮮熱」，這股熱潮以《文學案內》企劃的「朝鮮現代作家特輯」（1937年2月號）為濫觴，收錄了：

李北鳴〈裸の部落〉（赤裸的部落）

玄民〈金講師とT教授〉

韓雪野〈白い開墾地〉（白色開墾地）

姜敬愛〈長山串〉

李孝石〈蕎麥の花の頃〉（蕎麥花開時節）

張赫宙〈現代朝鮮作家的素描〉(現代朝鮮作家的素描)

這些作品除了李北鳴與韓雪野的作品之外，全部都是經過日譯的作品，從中也可窺見朝鮮文學者在戰爭初期的語言使用上仍以朝鮮文爲主的寫作方式。《文學案内》的特集刊行之後，《文藝》也策畫了「朝鮮文學特輯」(1940年7月號)，刊載了林房雄的〈朝鮮の精神〉、林和〈朝鮮文学の環境〉、張赫宙〈欲心疑心〉、俞鎮午〈夏〉、李孝石〈ほのかな光〉(微光)、金史良〈草深いし〉(草木森森)等作品，《文藝》的編輯後記上寫道：「對於朝鮮的作家們而言，現在正是以日本語創作最好的時機，總有一天，一定會帶給日本文學很大的收穫。」由此可知內地文壇是以日本文學的拓展來看待朝鮮文學的發展，這種視野也呼應了島田謹二提倡的「外地文學」論調。⁷⁶一方面，對於正在進行皇國臣民化運動的朝鮮而言，《文藝》編後記中鼓勵朝鮮作家以日本語書寫正具有呼應朝鮮政策的用意，想透過文學者們對於日本語作品的書寫帶動朝鮮文壇的日語書寫風氣，藉以達成語言轉換的目的。在戰爭期間日本的文藝誌與雜誌中多有朝鮮文藝作品的登載以及與朝鮮文學相關的評論，如《文藝》、《文學界》、《文藝首都》、《新潮》、《文藝春秋》、《改造》、《月刊文章》、《テアトロ》、《モダン日本》、《知性》、《婦人公論》、《新文化》等月刊誌、文學誌上皆有對朝鮮文學作品的介紹與「朝鮮特輯」的刊載，同時內地文壇還出版數量頗豐的朝鮮作家的單行本，引發了朝鮮熱潮。⁷⁷內地文壇中關於朝鮮的書寫除了朝鮮文學者外，內地的日本文學者們也有描述朝鮮的創作，戀愛議題如：石川達三的短篇小說〈鳳青華〉(1937)，石川的小說中描述一位曾經當過電影明星的在日朝鮮女性與被某位被稱爲「老師」的日本青年之間的戀愛故事，最終朝鮮女性與日本青年在「民族超越的不可能」下終告分手。此外，與謝鐵幹的〈東西南北〉與中西伊之助的〈赫土に芽ぐももの〉(萌芽於紅土上)

⁷⁶ 中村哲在論及朝鮮文學時也說道：朝鮮文學所使用的半島語言，是日本文學史上的另一派。由此也可見其將殖民地文學視爲日本文學的思維。參見〈外地文学の課題〉，《文藝台灣》1：4，頁265。

⁷⁷ 戰爭期間出版的單行本主要有：

1938年：張赫宙《春香傳》，新潮社。1939年：張赫宙《路地》，赤塚書房、《加藤清正》，改造社、《美しき結婚》，赤塚書房。1940年：申建譯編《朝鮮小説代表集》，教材社、張赫宙・俞鎮午・秋田羽雀・村山知義編《朝鮮文學選集》全三卷，赤塚書房、李光洙・金逸善譯《有情》，モダン日本社、金聖珉《綠旗連盟》，羽田書店、張赫宙《田園の雷鳴》，洛陽書院、金史良《光の中に》，小山書店。1941年：張赫宙《人間の絆》，河出書房、《沈清傳・春香傳》，赤塚書房、《曠野の乙女》，南方書院、《美しき抑制》，河出書房、金素雲《朝鮮民謠集》，新潮社、青木洪《耕す人々の群》，第一書房、李泰俊・鄭人澤譯《福德房》，モダン日本社、張赫宙《白日の路》，南方書院、金聖珉《惠蓮物語》，大元社，張赫宙《縁の北国》，河出書房。見朴春日《近代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朝鮮像》，前掲，頁359-360。

也都講述日本男性與朝鮮女性的戀愛故事，但在小說中作者們終究無法超越支配的意識形態，戀情的最後都以分離作為結束，就朝鮮女性而言，他們既無法超越跟日本男性之間的民族障礙，最終在朝鮮她們也無法擺脫封建社會中對於他們的多重束縛。日本內地作家描述的內鮮戀愛議題中，多是以這種糾葛來展開，從中也展示出殖民地女性對他們的吸引最終仍無法超越血緣之間隔閡。此外，將殖民地旅遊行旅私小說化的創作也是內地文學者的一個重要表現，就台灣而言，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庄司總一〈陳夫人〉都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之作，以朝鮮為對象的作品有：濱本浩〈旅愁〉、加藤武雄〈平壤〉、大佛次郎〈面影〉、井伏鱒二〈朝鮮の久遠寺〉等。

透過對戰爭期朝鮮文學者日本語作品的爬梳，可以進一步深入文學者的「親日」面貌，筆者試著從戰爭期重要的小說作品中進行考察，從小說的表述中探析朝鮮作家們對於帝國的協力與自我的展現。⁷⁸：

- 張赫宙：〈痴人淨土〉，日本：赤塚書房，1939年3月
- 〈加藤清正〉（長篇小說），日本：改造社，1939年4月
- 〈開拓地帶〉，日本：春陽堂書店，1939年10月（收於《大陸開拓小說集》）
- 〈美しき結婚〉（長篇小說），日本：赤塚書房，1939年11月（原題：處女の原理）
- 〈愛憎の記録〉，日本：河出書房，1940年8月
- 〈田園の雷鳴〉（長篇小說），日本：洛陽書院，1940年11月
- 〈人間の絆〉（長篇小說），日本：河出書房，1941年2月
- 〈七年の嵐（第一部）〉（長篇小說），日本：洛陽書院，1941年4月
- 〈曠野の乙女〉（長篇小說），日本：南方書院，1941年5月

⁷⁸ 本文討論的戰爭期間小說作品表以大村益夫、布袋敏博主編《近代朝鮮文學日本語作品集》中收錄的作品為主，筆者再酌以增補而成。參見氏編《近代朝鮮文學日本語作品集 1901-1938》創作篇（共五集），東京：綠蔭書房，2004年6月初版。《近代朝鮮文學日本語作品集 1939-1945》創作篇（共六集），東京：綠蔭書房，2001年12月初版。

〈美しき抑制〉（長篇小説），日本：河出書房，1941年6月（〈人間の絆〉第2卷）

〈春香傳〉，日本：新潮社，1941年7月

〈白日の路〉，日本：南方書院，1941年10月

〈緑の北國〉（長篇小説），日本：河出書房，1941年11月（〈人間の絆〉第3卷）

〈孤獨なる魂〉（長篇小説），日本：三崎書房，1942年2月

〈和戦何れも辞めさせず〉（長篇小説），日本：大觀堂，1942年3月（〈七年の嵐〉第2部）

〈幸福の民〉（長篇小説），日本：南方書院，1943年4月

〈開墾〉（長篇小説），日本：中央公論社，1943年4月

〈辻小説集〉，日本：八紘社杉山書店，1943年7月

〈浮き沈み〉（長篇小説），日本：河出書房，1943年11月

〈岩本志願兵〉（長篇小説），日本：興亞文化出版，1944年1月

金哲 〈冬の宿〉，日本：山都學苑創刊號，1938年2月

青木洪（洪鍾羽）：〈東京の片隅で〉，日本：《文藝首都》6：6，

1938年6月

《耕す人々の群》（長篇小説），日本：第一書房，1941年8月

〈ミインメヌリ〉，日本：《中央公論》57：2，1942年2月（1943年4月收錄於《朝鮮國民文學集》）

〈妻の故郷〉，朝鮮：《國民文學》，1942年4月

- 〈ふるさとの姉〉，朝鮮：《國民文學》，1942年10月
- 〈小さな慰問文〉（私小説），收錄於日本文學報國會編《辻小説》日本：杉山書店
- 〈鐵の職場〉，朝鮮：《國民總力》5：15，1943年8月
- 〈見學物語〉，朝鮮：《國民文學》3：12，1943年12月
- 金耕修〈新しき日〉，朝鮮：《東洋之光》，1：5、1：6，1939年5月、6月
- 李孝石：〈銀の鱒〉，日本：《外地評論》2：12，1939年2月
- 〈蕎麦の花の頃〉，日本：《モダン日本朝鮮版》，1939年11月
- 李孝石・鄭人澤譯〈一票の效能〉，朝鮮：《京城日報》，1940年4月10日
- 〈ほのかな光〉，日本：《文藝》8：7，1940年7月
- 〈秋〉，朝鮮：《朝鮮畫報》，1940年11月
- 〈春衣裳〉，日本：《週刊朝日》39：22，1941年5月
- 〈薊の章〉，朝鮮：《國民文學》，1941年11月
- 李泰俊・鄭人澤譯〈不遇先生〉，日本：《外地評論》2：12，1939年2月
- 金史良：〈光の中に〉，日本：《文藝首都》7：10，1939年10月
- 〈土城廊〉，日本：《文藝首都》8：2，1940年2月
- 〈箕子林〉，日本：《文藝首都》8：5，1940年6月
- 〈天馬〉，日本：《文藝春秋》18：6，1940年6月
- 〈草深い〉，日本：《文藝》8：7，1940年7月
- 〈蛇〉，朝鮮：《朝鮮畫報》，1940年8月
- 〈無窮一家〉，日本：《改造》22：16，1940年9月

〈コブタンネ〉《光の中に》, 日本: 小山書店, 1940年12月

〈光冥〉, 日本: 《文學界》8: 2, 1941年2月

〈泥棒〉, 日本: 《文藝》9: 5, 1941年5月

〈蟲〉, 日本: 《新潮》38: 7, 1941年7月

〈鄉愁〉, 日本: 《文藝春秋》19: 7, 1941年7月

〈月女〉, 日本: 《週刊朝日》39: 22, 1941年5月18日

〈天使〉, 日本: 《婦人朝日》18: 8, 1941年8月

〈山の神々〉, 朝鮮: 《文化朝鮮》3: 5, 1941年9月

〈鼻〉, 日本: 《知性》, 1941年10月

〈神々の宴〉, 日本: 《日本の風俗》4: 10, 1941年10月

〈嫁〉, 日本: 《新潮》38: 11, 1941年11月

〈親方のコブセ〉, 日本: 《新潮》39: 1, 1942年1月

〈Q伯爵〉, 日本: 《故郷》, 1942年4月

〈尹主事〉, 日本: 《故郷》, 1942年4月

〈乞食の墓〉, 朝鮮: 《文化朝鮮》4: 4, 1942年7月

李光洙・金史良譯: 〈無明〉, 日本: 《モダン日本》10: 12, 1939年11月

李光洙: 〈心相觸ふれてこそ〉(1)~(5), 朝鮮: 《綠旗》5: 3~5: 7, 1940年3

月~7月

〈夢〉, 日本: 《李光洙短篇集 嘉實》, 1940年4月

〈鬻庄記〉, 日本: 《李光洙短篇集 嘉實》, 1940年4月

〈亂啼鳥〉, 日本: 《李光洙短篇集 嘉實》, 1940年4月

〈山寺の人々〉(1)~(7), 朝鮮: 《京城日報》(夕刊), 1940年5月17

日~24日

香山光郎（李光洙）：〈兵になれる〉，日本：《新太陽》14：11，1943年11月

〈大東亞〉，朝鮮：《綠旗》8：12，1943年12月

〈元述の出征〉，朝鮮：《新時代》4：6，1944年6月

〈少女の告白〉，日本：《新太陽》15：10，1944年10月

俞鎮午・吳泳鎮譯：〈秋〉，日本：《朝鮮文學選集第1卷》，1939年12月

俞鎮午：〈夏〉，日本：《文藝》8：7，1940年7月

〈蝶〉，日本：《早稻田文學》7：7，1940年7月

〈汽車の中〉，朝鮮：《國民總力》3：1，1941年1月

〈福南伊〉，日本：《週刊朝日》39：22，1941年5月18日

李基永・申建譯：〈苗木〉，日本：《朝鮮小說代表集》，1940年2月

朴泰遠・申建譯：〈崔老人傳抄錄〉，日本：《朝鮮小說代表集》，1940年2月

安懷南・申建譯：〈軍雞〉，日本：《朝鮮小說代表集》，1940年2月

李泰俊・申建譯：〈野ばら〉，日本：《朝鮮小說代表集》，1940年2月

李泰俊・申建譯：〈農軍〉，日本：《朝鮮小說代表集》，1940年2月

李泰俊：〈寧越令監〉，日本：《福德房》，1941年8月

〈兔物語〉，日本：《福德房》，1941年8月

〈第一號船の插話〉，朝鮮：《國民總力》6：17，1944年9月

崔明翊・金山泉譯：〈心紋〉，日本：《モダン日本》11：9，1940年8月

崔貞熙・李蒙雄譯：〈地脈〉，日本：《朝鮮文學選集第2卷》，1940年9月

崔貞熙：〈幻の兵士〉，朝鮮：《國民總力》3：2，1941年2月

〈靜寂記〉，朝鮮：《文化朝鮮》3：3，1941年5月

〈二月十五の夜〉，朝鮮：《綠旗》7：4，1942年4月

韓雪野・李蒙雄譯:〈摸索〉, 日本:《朝鮮文學選集第2卷》, 1940年9月

許俊:〈習作部屋から〉, 朝鮮:《朝鮮畫報》, 1940年10月

大澤達雄(金達壽):〈をやぢ〉日本:《藝術科》8:11, 1940年11月

〈族譜〉, 日本:《新藝術》1:9, 1941年11月

金光淳(金達壽):〈塵〉, 日本:《文藝首都》10:2, 1942年3月

安懷南・鄭人澤譯:〈謙虛〉, 日本:《朝鮮文學選集第3卷》, 1940年12月

鄭人澤:〈見果てぬ夢〉, 朝鮮:《朝鮮畫報》, 1941年1月

〈殼〉, 朝鮮:《綠旗》7:1, 1942年1月

〈傘〉, 朝鮮:《新時代》2:4, 1942年4月

〈晩年記〉, 朝鮮:《東洋之光》, 1942年5月

〈雀を焼く〉, 朝鮮:《文化朝鮮》5:1, 1943年1月

〈連翹〉, 朝鮮:《文化朝鮮》6:2, 1944年5月

安懷南:〈温室〉, 朝鮮:《朝鮮畫報》, 1941年4月

李石薰:〈ふるさと〉, 朝鮮:《綠旗》6:3, 1941年3月

〈黎明〉, 朝鮮:《國民總力》3:4, 1941年4月

〈インテリ、金山へ行く!〉, 朝鮮:《文化朝鮮》3:6, 1941年11月

牧洋(李石薰):〈東への旅〉, 朝鮮:《綠旗》7:5, 1942年5月

〈どじょうと詩人〉, 朝鮮:《文化朝鮮》4:3, 1942年6月

〈先生たち〉, 朝鮮:《東洋之光》4:8, 1942年8月

〈血縁〉, 朝鮮:《東洋之光》5:7, 1943年8月

《静かな嵐》, 朝鮮:毎日新報社, 1943年3月

李貞來:〈愛國子供隊〉, 日本:《文藝》10:1, 1942年1月

- 鄭飛石：〈村は春と共に〉，朝鮮：《綠旗》7：4，1942年4月
- 〈山の憩ひ〉(一)、(二)，朝鮮：《新時代》3：4、3：5，1943年4月、
5月
- 〈愛の倫理〉，朝鮮：《文化朝鮮》5：2，1943年4月
- 森山一兵（李永福）：〈畑堂任〉，日本：《青年作家》1：6，1942年7月
- 金士永：〈兄弟〉(一)~(五)，朝鮮：《新時代》2：11~3：3，1942年11月~1943
年3月
- 趙容萬：〈ふるさと〉，朝鮮：《綠旗》7：12，1942年12月
- 〈佛國寺の宿〉，朝鮮：《國民總力》5：20，1943年10月
- 〈端溪の硯〉，朝鮮：《興亞文化》9：4，1944年4月（《綠旗》改題）
- 任淳得：〈名付親〉，朝鮮：《文化朝鮮》4：5，1942年12月
- 〈月夜の語り〉，朝鮮：《春秋》4：2，1943年2月
- 崔秉一：〈或る晩〉，朝鮮：《東洋之光》5：1，1943年1月
- 《梨の木》，朝鮮：盛文堂書店，1944年3月（創作集）
- 〈便り〉，朝鮮：《東洋之光》6：6，1944年6月
- 池内奉文（池奉文）〈權爺さん〉，朝鮮：《綠旗》8：3，1943年3月
- 玄薰〈巖〉，朝鮮：《春秋》4：9，1943年10月
- 張德祚〈行路〉，朝鮮：《國民總力》5：24，1943年12月
- 李無影〈宏壯氏〉，朝鮮：《文化朝鮮》6：1，1944年2月
- 《青瓦の家》（短篇小說集），日本：新太陽社，1943年9月
- 《情熱の書》（短篇小說集），日本：東都書籍，1944年4月
- 金聖珉：《綠旗聯盟》，日本：羽田書店，1940年6月

朝鮮文人協會編：《朝鮮國民文學集》，日本：東都書籍，1943年4月，收入：李光洙〈山寺の人々〉、李無影〈文書房〉、鄭人澤〈清涼里界限〉、田中英光〈吳王渡〉、俞鎮午〈南谷先生〉、宮崎清太郎〈父の足をさげて〉、鄭容萬〈船の中〉、青木洪〈ミインメヌリ〉、牧洋〈東への旅〉

石田耕造（崔載瑞）編：《新半島文學選集第一輯》，朝鮮：人文社，1944年5月，收入：香山光郎〈加川校長〉、李泰俊〈石橋〉、鄭人澤〈かえりみはせじ〉、宮崎清太郎〈蒼い顔〉、咸世德〈エミレエの鐘〉、飯田彬〈たたかひ〉、汐入雄作〈選ばれたる一人〉、金士永〈聖顔〉、吳本篤彦〈羈絆〉

石田耕造編：《新半島文學選集第二輯》，朝鮮：人文社，1944年12月，收入：香山光郎〈大東亞〉、石田耕人〈燧石〉、小尾十三〈登攀〉、吉尾なつ子〈わが縁〉、清川士郎〈道〉、奧平修一郎〈ふたたび〉

香山光郎等《半島作家短篇集》，朝鮮：朝鮮圖書，1944年5月，收入：鄭飛石〈幸福〉、鄭人澤〈愛情〉、香山光郎〈蠅〉、趙容萬〈佛國寺の宿〉、高野在善〈軍裝〉、張德祚〈行路〉、俞鎮午〈祖父の鐵屑〉、李無影〈花窟物語〉

從上述的戰爭期間作品中可以發現朝鮮作家創作上展現的多元面，從中也可看出如：張赫宙、金史良、李光洙、洪鍾羽、鄭人澤、李石薰等人在戰爭期間於創作上表現出的積極性。日本在戰爭期間由於要推動國家政策的緣故，逐漸重視殖民地的戰略位置，在其發展大東亞的藍圖上，台灣與朝鮮成爲其拓展國家版圖的重要支撐。朝鮮方面，統治當局希望藉由文化層次的推動達到內鮮一體、皇道思想的養成，以順利動員「朝鮮人」完成東亞圈的建構目的。受到此思維的影響，朝鮮文學也在「政治性」的操作下深入了內地文壇，這些文學作品的出版與刊載橫跨了內地與朝鮮，特別是對日本內地而言，朝鮮文學的興起被視爲是日本文學的外地延伸，同時也爲日本提出的東亞共榮圈提供了最佳的文學發展途徑。⁷⁹

本文擬從幾個文本來探究日本的大東亞文學圈中之朝鮮文學樣貌，首先不能忽略的是，以日本語創作將朝鮮介紹於內地文壇的重要人物--張赫宙，對張赫宙而言，

⁷⁹ 西川滿在〈外地文學の奨勵〉中提及了法國在法屬阿爾及利亞與法屬印度支那設置的外地文學獎，提醒統治當局外地文學的建立與國策推行的輔助關係，期待對於發展殖民地文學的重視，同時也將殖民地文學置入日本文學發展的脈絡中，他說道：如果中央文壇的有力人士能夠認同我這樣的說法，能爲不只台灣，也爲朝鮮以及大東亞戰爭之下納入共榮圈的南方外領諸島設下外地文學獎的話，我確信這不只對振興外地文學有幫助，對於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也能發揮很大的力量。見《新潮》7月號，1942年7月，頁471-473。

其從左翼立場轉而為帝國服務的「親日」立場，至今仍然備受討論，其成名作〈餓鬼道〉藉由對於朝鮮底層農民悲慘生活的揭露，表達了對統治者的控訴，深刻反應了其反權威、反霸權的立場，但到了決戰時期的《開墾》、《岩本志願兵》中卻表現出對內鮮一體國策的支持，其中的糾葛為何？筆者試著從其創作中釐清此變化軌跡。從張赫宙豐富的作品數量中可以發現，作者的創作中除了有寫實主義的作品外，一部分的作品中可發現作者自傳式的表述，如〈權という男〉(1934.6)、〈仁王洞時代〉(1935.6)、〈深淵の人〉(1937.4)、〈春香傳〉(1938.4)、〈路地〉(1939.2)〈愛憎の記録〉(1940.8)〈白日の路〉(1941.10)〈岩本志願兵〉(1944.1)，透過這一系列的作品中可以窺見作者自身的影子。〈權という男〉之中的主角金東一是一位初等學校的囑託教員，小說中表述了這位作者半自傳式的主角金東一的心理變化，主角自我解嘲道：

我是一個囑託教員。我作為初等學校教員而終老之事，是作夢也料想不到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習，只是感覺有點寂寞。不知道從何時起我不再閱讀，甚至於連書桌上的灰塵也懶於拂拭，就像那些壓迫到我後院與眼前的松林一樣，我自身也化成一種植物的狀態。……我曾經以一時熾烈的熱情投入於社會主義運動，但等到這份熱情冷卻之後卻陷入深深的懷疑當中。⁸⁰

這是作者於 1934 年的作品，正逢日本大肆取締左翼運動，在這篇小說中可以看到作者透過這位金東一表述了對於左翼運動的懷疑，以及自身對於教員生活的厭倦。另外，〈靈與肉--仁王洞時代〉是作者的長篇小說〈靈與肉〉的第一部，這是一部成長小說，同時具有濃厚的作者自傳色彩。小說是以回想展開敘事，主角「我」（金龍榮）在成為大人後，以回想的方式展開其六歲到八歲的故事，我的生母是在市場的酒家幹活的女人，是父親的小老婆，「我」從小便離開生母跟著父親與大老婆住在以祖父為中心的仁王洞的宗家。這種宗家制是朝鮮仕紳社會受到傳統儒教影響下以父系社會為主的繼承體制，嫡長子為宗家的中心，是傳統朝鮮社會中重要組成。小說中的「我」雖然是庶出，但是由於父親並沒有其他的小孩，所以「我」認為自己理應被當成嫡子來對待，尤其「我」聰明伶俐，而叔父的孩子仁榮雖年長「我」二歲，但並不甚聰明，因此，「我」一直認為應當會受到祖父的特別關注而成為仁王洞金氏的嫡孫，但事實並不如此，四周的人對「我」並不友善，加上叔父們及父親的大老婆都對「我」很冷淡以及經常受到仁榮的虐

⁸⁰ 見〈權という男〉，收於南富鎮・白川豐編《張赫宙日本語作品選》，東京：勉誠出版，2003年10月初版，頁160。

待，因此年幼的「我」感到寂寞而孤獨，幸好「我」在未婚且溫柔的姑姑，以及平民身分的玉女姐弟的安慰下得到了慰藉。小說中提到了「我」跟生母的見面，對於生母並非如「我」所想像的溫柔而感到失望，而最能給予安慰的姑姑也要結婚，因此「我」感到相當的孤獨。此時，憲兵來到了村裡，宣告了兩班支配的結束，祖父因而得病，最終去世，「我」也漸漸感到無立身之處，因此下定決心跟著生母離開了仁王洞，小說以主角「我」跟母親的離開結束。張赫宙在〈靈與肉--仁王洞時代〉發表之後，又重新修改並添加了「我」到 20 歲左右的成長過程，發表〈孤獨なる魂〉，「我」在跟著生母一起生活後，歷經生母情緒化的影響，並感到強烈的孤獨感，之後「我」跟唯一朋友安因三・一運動之際選澤的不同，而遭到友情的幻滅，後又歷經初戀的單相思與破滅，然後結婚，結婚之後又陷入扶養父母的困難與妻子期待的落差，使「我」的孤獨感日益增深。在此自傳式的小說中，我一生中在挫敗生活，小時的挫敗讓他逃離宗家，十幾歲時因母親帶來的挫敗而逃離母親，到了就職、結婚以後卻感到無處可逃的壓迫感，因而小說中展現了深刻的孤獨感。張赫宙的庶出身分也使得他如小說中的「我」一樣，在傳統朝鮮社會中是一種不被認同的存在，這種「孤獨感」與對朝鮮社會封建一面的無力感可能造成了作者成為「親日」的一員的部分原因。從另一面可以證明筆者的推想，仔細審視張赫宙的作品，他的「愛憎的記錄」只是單行本的題名，並不是創作，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張赫宙透過書寫所展現的愛恨記錄，這種愛恨的記錄是透過他作品中對社會的憤怒，控訴來表現，在他對於「志願兵」的描述中也展現了這種愛恨與憤怒的特質，甚至從他描述戰爭、國策、時局相關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這種傾向。白川豐在討論張赫宙的小說作品中說道：

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感情與心理狀態，即使他的作品主題有異，但其中仍有共通之處，不論對社會正義、家庭關係或內鮮一體的主張，作者首先直接表現他的感受，其中沒有邏輯與分析，完全是一種情感的反應。(中略)他可從民族階級的愛恨意識轉變為對家族朋友的愛恨意識，甚至也轉變到對國家的愛恨意識。為什麼有此種傾向，因為受制於複雜身世，他非嫡長子身分，以及幼年時期的放浪經驗。⁸¹

在張赫宙的自傳式作品中可以看到兩個明顯的面向，一種是對於過去的神經質反應，另一種則是爲了想挽回自身的劣勢而立志向上的「出世」心態，從作者的自

⁸¹ 見白川豐《殖民地期朝鮮の作家と日本》，岡山：大學教育出版，1995年7月，頁161-162。

傳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刻意強調自己學生時代的優等生身分，這種不認輸意識與被社會淘汰的恐怖心理也造成他對於時代的變化的敏感，特別是從他對於時局與國策的書寫中明顯的可以看見此種意識的反應。此外，張赫宙以歷史人物作為主角的歷史小說作品也經常被認為具有討好當局的成分，作家以歷史為背景的創作共有：〈加藤清正〉（1938.9）、〈七年の嵐〉（第一部）（1939.4）、〈和戰何れも辞めせず〉（1941.12）、〈花郎〉（1942.10-1943.2）⁸²、〈浮き沈み〉（1943.11）等五篇。林浩治對於張赫宙撰寫的〈加藤清正〉批評道：

在小說中，張赫宙表現出對於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沒有任何批判性的接受，他是藉此表達對於日本軍國的忠誠心，到了此階段張赫宙的思想已經沒有任何反對軍國主義的成分。他甚至放棄了作為朝鮮人的民族立場，內心只有抱持著對於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恐怖心態。⁸³

林浩治點出了張赫宙作為一位朝鮮文學者對於當局的恐懼心態，但是〈加藤清正〉以及作者繼續撰寫的〈和戰何れも辞めせず〉、〈浮き沈み〉等以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為題的小說中，是否真如林浩治所說的是全然支持軍國主義的表現？從張赫宙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他以武將的精神作為書寫的主題意識，其中他撰寫的以新羅時代的愛國武將元述為主角的〈花郎〉，小說以表現元述的武士精神作為主軸，描寫了元述沒有戰死沙場而返鄉，在飽受家族的冷淡後決意一死的悲劇英雄角色。關於元述的故事，崔載瑞的〈非時の花〉（1944.5-8）、李光洙的〈元述の出征〉（1944.6）也都將元述的悲劇角色小說化，筆者以為，這種對於歷史英雄的召喚與日本浪漫派在翼贊中倡導的「王道復古」思想有關，特別是將新羅時期的「花郎道」等同於「武士道」的精神有助於鼓吹讀者們的為天皇盡忠的翼贊意識，然而小說中卻也隱含了對於武士道或花郎道中「不成功便成仁」的死亡質疑，元述的死亡也突顯出對於「英雄必死」的逆向思考。另外，張赫宙以豐臣秀吉的兩次朝鮮戰役：壬辰倭亂（文祿之役）、丁酉倭亂（慶長之役）為主的小說中，依照作者自己的構想，是要以四部小說組成一個長篇，透過〈七年の嵐〉的展現東亞視野⁸⁴：

第一部：悲壯の戰野（以加藤清正為中心）

⁸² 筆者案：新羅時期鍛鍊愛國貴族子弟之精神、肉體的團體的指導者稱為花郎。

⁸³ 見林浩治〈在日朝鮮人日本語文學論〉，東京：新幹社，1991年7月初版，頁232-233。

⁸⁴ 見《京城日報》記事，1938年10月9日、10月27日。

第二部：智者的煩惱（以小西行長為中心）

第三部：義將的最後（以李舜臣為中心）

第四部：驕傲的使者（以沈惟敬為中心）

張赫宙期待透過這四部曲來展現對東亞文化的綜合描寫。雖然在第一部的加藤清正中，作者對於加藤清正的正面描寫削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而遭到批判。張赫宙在《朝鮮日報》的說明了其創作的目的：

「誠」是我寫作此長篇（〈七年の嵐〉四部曲）的重點，至於戰役的描寫則是次要的。⁸⁵

也就是說，張赫宙是透過加藤、小西、李舜臣、沈惟敬各自的「誠」的表現作為他此創作的主题，從作者對於「誠」的強調可以看出這四部曲不僅是其對於時局的附和之作，其中更有作者想藉歷史來貫穿「誠」的文學書寫之呈現，從而也可以看出張赫宙企圖從不同民族的人物中追尋普遍性價值的嘗試。

除了歷史小說外，張赫宙的〈岩本志願兵〉被視為歌頌軍國主義的作品，此篇作品是東京《每日新聞》上的連載小說，後改題為〈巡禮〉譯為朝鮮語，連載於總督府的御用報紙〈每日新報〉上。作者在 1943 年 2 月的《每日新聞》上的發言，後來成為單行本的「序」，張赫宙說道：

沒有比在朝鮮實行徵兵制更大的感動了，特別是生活於內地的朝鮮青年們有著更大的感動。當這種感動的姿態映入我的眼簾之際，從作家的本能我非常想將這些化成作品。（中略）所謂完全的日本人就是指皇國臣民，也就是「奉公滅私，完全盡忠於大御心（天皇）」，（中略）因為這個事變（滿洲事變）而自覺到對國家的愛，歷經支那事變現在又迎向大東亞戰爭，現在衷心祈求完遂這個愛情的機會終於來臨。這就是我想去擔負起服兵役的義務，此外別無所求。也只有這樣我才能本能的自覺到我真正奉獻給天皇。（中略）新羅時代有所謂花郎的武士制度，他們有永不退縮的戰鬥之嚴格規定，遵守著敗退即是死亡的不成文規定，他們擁有不敗的潛在力量。各位

從今天開始要義無反顧誓作天皇的後盾，我們應當懷著感激之身，希望你們要永

⁸⁵ 見李源朝〈新協劇團公演の春香傳觀劇評〉（上），《朝鮮日報》1938 年 11 月 3 日。原文為韓文，轉引自白川豐《殖民地期朝鮮の作家と日本》，前掲，頁 149。

遠記住完成這個重大的責任。⁸⁶

在此「序」中張赫宙展現了對「皇道思想」的完遂以及徵兵制的歌頌，這篇作品實際上是作者在 1938 年 4 月參加在京城志願兵訓練所的體驗，可視為官方要求下的動員作品。時隔五年，當初的志願兵制度到了 1943 年因時局的緊張改成了義務性的徵兵制，也因此作者在出版序上才又增加了對於徵兵的說法。〈岩本志願兵〉中的主角是在朝鮮成長的「我」，為了體驗而進入京城志願兵訓練所，從負責訓練的教官口中，聽到成長於內地的朝鮮青年岩本的故事。岩本本來是一位問題少年，但在一次前往埼玉縣的高麗神社參拜之時，突然產生日本人的自覺然後去應徵志願兵，漸漸的成為了優秀的兵士。小說中雖然以呼籲國策的方式進行書寫，但從岩本身上卻延伸出兩個議題，其一是關於「差別意識」的民族議題。岩本在內地因無法成為志願兵而遭受日本人的取笑，感到屈辱。張赫宙的作品中觸及了這個面向，但卻沒有再進一步的探討，使得〈岩本志願兵〉被歸為動員作品，無法表達更身的文學信念。另外是透過岩本表達了對於內鮮一體的懷疑。關於內鮮一體的疑問，作者只講到他因參拜神社而頓悟到內鮮同祖，因而毫無疑慮的成為日本人。小說中強調：「軍隊訓練是通往皇民化的捷徑，我認為為了促進朝鮮的皇民化徵兵制度的實施絕對是有必要的。」⁸⁷〈岩本志願兵〉中所展現出的精神雖然是一種國策翼贊的態度，但張赫宙小說中所隱含的視野卻表現了戰爭期朝鮮人最重要的精神面向：對日鮮一體的懷疑以及對於身分困擾。除了呼應徵兵制的〈岩本志願兵〉外，張赫宙對於國策的書寫作品還有〈開墾〉、〈幸福の民〉、〈新しい出發〉等篇，呼應日本鼓勵朝鮮人前往滿洲從事開拓工作的政策，可視為一種「開拓文學」。這些政策小說中雖然以國策的實踐為中心，但主角人物的朝鮮視野也透露出作者對於自身朝鮮民族的同情，並且也暴露了開墾的過程中統治階級與滿洲地方人士透過權力所加諸於朝鮮開墾者上的暴力。如他在 1940 年完成的〈密輸業者〉，透過主角安順一的視角，揭露在圖們江國境為了生存而走私的朝鮮百姓，安順伊自己對於自身處境也感到痛苦而極力想掙脫，但是親生姐姐被滿洲地主強押為妾，為了要將姐姐贖出企圖再完成一趟大買賣就要離開，但受制於討伐隊、朝鮮人特設部隊及滿洲國突擊隊的干擾，最終被捕而處以死刑。張赫宙在小說中以特殊的走私業者的視角切入，對於政府鼓吹朝鮮民眾移住滿洲以樹立自己帝國勢力的作法進行控訴，因為政府的政策導致了像安順一這

⁸⁶ 見《岩本志願兵》「序」，京城：興亞文化出版，1944 年 1 月，頁 4-5。

⁸⁷ 見《岩本志願兵》，前揭，頁 39。

般困苦的百姓的盜賊化。就張赫宙的創作而言，其於戰爭期的作品除了親日文學外還有更多元面向的展現，不能單純的將之歸於附和國策的御用文人。

除了張赫宙外，金史良的作品中也展現了特殊的朝鮮風貌，雖然與張赫宙一樣被統治者賦予同化動員的角色，但他的小說中卻透過呼應國策的議題展現出相當朝鮮的一面，跟張赫宙小說中所表現的敏感情感與菁英立場不同，此外，金史良在畢業之後往來於內地、朝鮮之間，並且採用日語與朝鮮語的雙語創作，由於當時林房雄、田中英光、辛島驍等日本人正大力呼籲殖民地文壇以日本語作為創作語言，因此作家以雙語呈現的創作可視為其於日本與朝鮮的一種平衡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對於殖民語言的抵抗策略，透過金史良的作品，可以看到其所呈現出日據時期的朝鮮大眾貌。1939年金史良的〈光の中に〉刊出，在日本得到極高的評價，並被提名為1940年芥川獎的候補作品，此也是內地文壇接受朝鮮文學的重要指標。金史良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內地文壇的注目，與當時在朝鮮推動的內鮮一體政策有很大的關聯，小說中以多層次的朝鮮人像的展現處理「內鮮一體」之命題。包括：主角：「我」--朝鮮人的知識人菁英、山田春雄：內鮮混血的小孩、山田半兵衛：內鮮混血的流氓、李：勞動階層的朝鮮人、貞順：被虐待的朝鮮女性，春雄的母親。金史良透過這些不同背景的朝鮮人來展開整個敘事。小說以乖僻而欺善怕惡的混血少年山田春雄為中心，主角「我」南是一位留日的朝鮮人大學生，並且擔任協會的市民教育的夜間部老師，山田春雄是在協會的兒童部上課的學生。山田的父親是內鮮混血的日本人，母親為朝鮮人。山田的母親貞順是從朝鮮餐廳跟著流氓父親半兵衛中私奔的可憐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飽受半兵衛的虐待，而親生兒子春雄也從未承認他朝鮮母親的存在，模仿日本人的樣子而生活，並且因為自己為朝鮮人的後代而感到屈辱、自卑，公開的跟來自朝鮮的南老師作對，嚴重的厭惡朝鮮否認自己的朝鮮身分。作為殖民地知識菁英的南，被學生稱為ミナミ，他自己說道：

不知何時我成了ミナミ先生，我的姓雖應該讀作ナム，但因為各種的理由而被叫成了日本風的名字。我的同事是最先稱呼我這種日本風名字的人，我本來對於這種叫法相當介意，但是後來我認為跟那些天真無邪的小孩一起遊玩的時候也許還是這樣比較好。我也經常問我自己，這並不是因為偽善或是卑屈。如果小孩中有朝鮮小孩的話，我絕對會要求稱呼我為ナム，我自己這樣的辨明，這樣對於朝鮮

小孩或內地的小孩就不會造成不好的影響⁸⁸

身為菁英的南與來上課的自動車學校的學生：李，面對民族的議題有了迥然不同的反應，李對於南偽裝成日本人的樣子感到相當的質疑，認為既然是朝鮮人就該以朝鮮人的樣子生活，沒有必要卑屈的偽裝自己是日本人，李自己要以堂堂的朝鮮人身分生存在內地。金史良在此將南與李作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一位是帝大的殖民地高材生，一位是以當計程車司機為志的勞動階級，在認同上問題上卻出現了妥協與絕對的反差，在小說中形成拉扯的張力。另外，透過對於春雄及他的父母的描寫，也突顯出殖民暴力的議題，春雄為了不讓人差別對待，堅持反抗自己朝鮮的血緣，對於母親的受虐也抱持著沉默的旁觀態度。一方面春雄的父親半兵衛，這個擁有內鮮一半血緣的日本人對於朝鮮妻子的暴虐，特別是針對民族上的歧視給予的打罵都突顯了當時代內地人與朝鮮人位階上的差異。小說最後春雄跟南坐在長長的階梯上，春雄說：「老師，我知道你叫甚麼名字喔。」南回答：「是嗎，你說說。」小孩子靦腆的往前跑說：「是ナム老師。」南在與春雄的交往過程中，逐漸從ミナミ回到ナム，透過矯正小孩所抱持的朝鮮自卑感的過程，自身也得到了救贖，而真正面對、認同了自己的朝鮮人的身分。〈光の中に〉雖然是呼應朝鮮的「內鮮一體」的創作，但金史良的創作中並未一味的要求政策的實踐，而是透過內鮮一體的主題，道出了朝鮮人在殖民地中不被認同的痛苦與掙扎，表現強烈的脫差別化的要求。小說中李詢問南：「為什麼像老師你這樣的人也要隱瞞自己的名字？」⁸⁹道出了當時朝鮮人的處境，即使是殖民地的菁英在民族議題之上也要面對最為困難的掙扎。金史良描寫的山田半兵衛的形象，生動的表現出以日本人支配立場自居的卑屈朝鮮人像，對於日本的統治無法批判與對抗，只能對於自己的同胞進行虐待與剝削，半兵衛對日本的卑屈與在朝鮮人面前的耀武揚威貌反映出日據時期的部分朝鮮人樣貌。

另外在小說〈天馬〉是以當時的朝鮮日語文壇為對象的小說，作家討論了當時最為重要的話題，即朝鮮語創作的存續議題。小說的主角玄龍，是典型的親日文學者，玄龍在小說中說道：

我再也不要朝用朝鮮語創作了，朝鮮語就像大便一樣。怎麼說呢，因為朝鮮語是到

⁸⁸ 見〈光の中に〉，《文藝首都》7：10，1939年10月，頁4。

⁸⁹ 同前註，頁5。

滅亡的詛咒。⁹⁰

玄龍否定了朝鮮語的創作，一方面，青年評論家：李明植對於玄龍的說法提出了反駁，他說道：「朝鮮語是可以創作出文學作品的。」並提出「朝鮮有八成的文盲，並且識字的人有百分之九十只能閱讀朝鮮文字。」⁹¹點出了朝鮮社會的現實面，因此提出必須以朝鮮語創作的必要性：

以朝鮮語的創作給予人們文化之光，又能讓這些人感到愉悅，這是不用討論也可理解的不是嗎？現在，在緊張的時局中，朝鮮文字的三大新聞盡到了重要的文化責任。朝鮮文字的雜誌與刊行物也豐富了民眾的心靈。朝鮮語很明顯的跟九州的方言和東北方言是不同的類型。當然我不是反對用內地語進行書寫創作，至少我不是極端的言語愛國主義者，能夠寫作的人為了能夠更為廣泛的傳達我們的生活、心情、藝術，更應當好好創作。不滿足用內地語來書寫的人，還有為了無法用書寫來表達的藝術，我們應當尋求能夠理解的內地的文化人支持與幫忙，迅速的設立翻譯機關，努力的把他們介紹出去。有一派的人說，如果不是用內地語創作的話，就不要創作，這真是個荒謬的說法。⁹²

金史良小說中的主角人物是有現實的模型的：如「玄之上龍之助」玄龍暗指評論家金文輯、作家田中暗指田中英光、大村是綠旗同盟的負責人津田剛、角井暗指京城大學的教授辛島驍、女性詩人文素玉指的是盧天命。當時金史良雖是住在東京，但經常往返於日朝間，從現實上對於朝鮮文壇應該採取日本語或者朝鮮語有實際的見解。就張赫宙而言，他提出他的日語創作是爲了讓世界更多的人理解朝鮮的悲慘面，而金史良則站在殖民地的現實層面提出了以國語爲中心的書寫中必須兼容朝鮮語的創作。

除了作家個人的單獨創作外，因大東亞戰爭的爆發而於日本、朝鮮出版的《朝鮮國民文學集》、《新半島文學選集》（第一輯、第二輯）、《半島作家短篇集》也是一種特殊的存在。統治者企圖透過文學集的量化出版強化朝鮮文學者們的翼贊力量，特別是受到大東亞戰爭的開戰的影響而興起的「國民文學」風，此風潮從內地文壇傳至朝鮮文壇。戰爭期間除了《國民文學》、《國民總力》、《國民詩歌》的創刊外，國民文學選集的出版也是奠定「國民文學」的重要方針，藉由對於「國

⁹⁰ 本文使用〈天馬〉文本，收於黑川創編《〈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3--朝鮮》，東京：新宿書房，1996年3月出版，頁138。

⁹¹ 同前註，頁139。

⁹² 同前註，頁139。

民」的養成集結國民的動員力量。如：《新半島文學選集》第二輯中香山光郎（李光洙）的〈大東亞〉發表於 1943 年 12 月朝鮮的御用團體「綠旗聯盟」的機關誌《綠旗》，從題目我們就可以查知其內容充滿了國策色彩。李光洙以自己喜歡的異民族間的戀愛結婚與民族性的問題的題材，創作了〈大東亞〉。小說中以上海同文書院教東洋史的日本人笈教授與中國人教授范教授為敘述中心，刻意透過他們兩人的友誼塑造中日友好的象徵。笈教授所寫的〈周禮和支那的國民性〉這篇文章中，批評中國人的國民性並倡導日本精神優秀的正當性。中國的范教授讀了大受感動，將自己的兒子范于生託給因日中戰爭爆發而返國的笈教授，這位少年在笈教授的家中生活中受到笈教授思想的影響，並通過與笈教授的女兒朱美的交往中認識到自己祖國人士的虛偽、自私自利、趨炎附勢，因而厭惡權謀。這位少年雖為中國人但已自覺了日本精神，當他回到戰地中國並向日本表示了忠義之後，又選擇回到日本，他深愛的朱美身邊。從小說的鋪陳可以看見李光洙的這篇時局小說整個細部的描述與內容呈現支離破碎，僅是勉強的把國策理論放進小說。雖是作為動員作品但內容的不合理性讓人質疑這種國策小說的有效性？小說當中失掉了李光洙原本的個性與創造性，並重複一種過於簡單的國策論理顯得沒有說服力，反而讓讀者感覺奇怪。李光洙雖然在國策翼贊下寫了許多相關作品，但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如被收錄於《半島作家短篇集》中的〈蠅〉，這篇小說有作者強烈的自傳性質，小說中「我」因為年齡的關係無法參與勤勞奉祀運動，但又非常強烈的抱持著為國奉獻的心情，班長經不起他的哀求最後派給他趕蒼蠅的工作，對於這個工作「我」充滿感激的接受，並積極的展開撲蠅的工作，最後他殺了 7895 隻蒼蠅，滿足的認為他終於做了對國家有助益的工作。在這篇小說中，李光洙透過滅蠅展現了喜劇的敘事效果，從荒謬的鋪陳中諷刺了翼贊工作。

此外，石田耕人（崔載瑞）的〈燧石〉發表於 1944 年 1 月的《國民文學》。主人公「我」為了應徵學徒出陣的志願訪問了慶州，並在途中緬懷慶州與奈良所象徵的古代史中的內鮮一體。在旅行途中「我」在列車裡邂逅了精通打石的老人，老獵人告訴「我」，他一生都想報效國家但因為時機無法進入軍隊，現在時機終於到來，他返鄉的孫子即將就要志願成為學徒兵，「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由於朝鮮實施的學徒志願兵比預想的人數要少，因此總督府改變策略而帶有半強迫性的志願勸誘，崔載瑞正好擔任慶北的班長因而寫作了此篇小說。又，《半島作家短篇集》的 8 篇作品中，雖然份量相當短少，但卻展現了當時後戰爭氣氛下的朝鮮日常生活，可以說是表現國民文學的最適當題材。

從上述朝鮮文學者的文本中可以窺見戰爭期的文學作品中實際上展現作者不同的關懷，張赫宙對於時局的敏感性使得其作品中既有最「皇民」的部分也有「反國策」的面向，此外，金史良透過內鮮一體與國家語言的議題呈現出對於內鮮一體、皇道思想的抵抗思考，李光洙則在時局下繼續對於異國戀情的書寫，雖然應時局所需加上了國策的色彩，但基本上仍是一種浪漫書寫模式，繼承了他對文學的浪漫喜好，可以說在大東亞的號召下，朝鮮文學從不同的面向展開了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文壇也因為有了朝鮮聲音使得戰爭時期的文學表現更顯豐富。

小結：

朝鮮文壇與學術界在戰後展開對「親日派」與「親日文學」的總清算，1948年9月韓國民族政經文化研究所編的《親日派群像》中列舉了從中日戰爭開始至日本敗戰為止的韓國各界對日協力者之親日行爲。1949年由高元燮編，白葉文化社出版的《反民罪狀記》中公開了對於親日派的公訴內容與過程，並且以強烈的遣詞將親日派定罪，其中更稱呼李光洙爲「皇道的賣文家」、「變節高手」。⁹³對於韓國社會而言，長期以來「親日派」皆被以道德觀來加以檢視，並被冠上賣國者、叛國賊等負面的意涵。此種親日等同於叛國的意識形態，必須給予重新的審視，這可從朝鮮日本語世代的養成得到反證。以朝鮮的日本語文學者世代來觀看，第一代的李光洙、朱耀翰透過日本語的學習完成了朝鮮近代文學的改革，是一種對朝鮮文學的使命感表現，將從日本文學援引而來的文學思潮以朝鮮語進行了創作表現，至第二世代的文學者張赫宙、金史良等，對於日語的使用是基於實際上的功效性，他們選擇以日語表現朝鮮，期待能夠將朝鮮認知廣泛的傳達至世界，而新一代以《綠旗》、《國民文學》爲創作園地的日語作家，如金士永、青木洪、安東益雄、吳本篤彥、城山昌樹等人是受到日本大眾文化影響下的世代，他們接受日本語與文化，他們視日文書寫爲理所當然。從三個世代對語言的使用也可窺見朝鮮的殖民認同也從開始的抵抗逐漸的走向模糊的灰色認因地帶，戰爭的爆發正式的引爆了認同的議題，「親日」背後隱含的對殖民主的憧憬、殖民近代化的影響以及文學者們透過親日而欲完成的「脫差別化」都是值得注目的部分。韓國一直到了1966年林鍾國的《親日文學論》才重新檢討「親日派」的文學表現，並重新審視親日派文學者的「親日」言論與內涵，提醒抱持著意識型態的民

⁹³ 參見大村益夫《〈親日文學論〉解說》，收於林鍾國著《親日文學論》，前揭。

族主義者對於「親日派」的重新反思，並試圖從親日文學者的親日軌跡與作品中重新探究「親日」所隱含的殖民內化議題。近來，日本學者大村益夫、白川豐、川村湊及韓國學者南富鎮、林浩治、朴春日、任展慧等人皆嘗試擺脫過去意識形態的評斷方式，從後殖民、殖民地近代性等方面進行論述。筆者在討論朝鮮文學者參與日本大東亞建設的過程中，透過對於朝鮮殖民與文學史發展的面向進行爬梳，並且對於「親日派」的出現以及「親日文學」進行了細部的文本分析，期待能對此時期的朝鮮文學動員有更進一步的發現，以及更為深入的釐清。



